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成為工人之後：在孟加拉加工出口區、都市貧民區與 NGO 的女性權利實作

Becoming a Worker: the Practices of Women's Rights in EPZs, Urban Slums, and NGOs in Bangladesh

甘睿涵

Jui-Han Kan

指導教授：王梅霞 博士

Advisor: Mei-Hsia Wang, Ph.D.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July 2019

doi:10.6342/NTU201903708

謝誌

這本論文能夠完成，受到許多人的幫助，還有數不清的包容、敦促、鼓勵。雖然現階段的我沒有足夠能力將論文以孟加拉友人能理解的語言呈現，我仍然希望將那些珍貴的善意在此具名，並期盼未來能有機會向你們補上這份謝意。

首先我要謝謝揚明光學公司，如果不是公司提供獎學金並開放我進入位於達卡的工廠，就不會有後續的故事。特別感謝公司在孟加拉廠的職員們，Roy、佳琪、Megan 姊、張師傅、高老師、邱大姊、Tarek、Monir、Ashraful、Shwapna、Shamuli、Amina、Rebecca，你們的幫助對於當初毫無在地連結的我而言，是莫大的鼓舞。

相同的感謝要給 Nari Uddug Kendra 的執行長 Mashuda，Awaj 基金會的 Nazma 和 Shirin，Korail 的 Hasan、Jahanara、Fatema，你們對於所專注議題的長久耕耘，啟發了這篇論文。孟加拉友人 Lusana、Sabrina、Maryam、Rumi、Nusrat，謝謝你們和我分享生活、介紹我認識你們的家人，對我而言你們不僅是研究上的引路人，更是在陌生異地無比溫暖的慰藉。

謝謝 Learn Bangla 語言中心的老師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們，Ashley、Stefanie、Rebecca、Roslin、Elizabeth、Annemiek、Olivia，還有因緣際會認識的馬來西亞留學生 Joanne、欣瑜，你們慷慨地和我分享你們眼中的孟加拉，以及身為外國人在孟加拉生活、工作、求學的憂喜，這些經驗談每每將我拉出自己的牛角尖，田野生活的挫折和鬱悶也總在與你們談天說地中悄然紓解。

當然一定要感謝的是師長們，作為指導耐心敦促我的梅霞老師，以及二話不說答允擔任口委的欣怡老師、清大人類所怡潔老師；在課堂內外指點迷津的開世老師、學誠老師、正衡老師、社會所黃克先老師、政大宗教所黃柏棋老師、蔡源林老師。總是胡思漫想又容易裹足不前的我，真的很幸運在就讀研究所的不同階段，從老師們那裡得到啟發、勉勵，一點一滴都化為成長前進的養分。

謝謝在這段時間陪伴在身邊的研究所好朋友們，必修、孟瑢、韋樺、博雯、優、佳翰、立元、佳錚、盤針、泉吟，有你們一起摸索、暴躁的路程，即使艱辛不減卻有趣數倍。也謝謝經常把我從憂鬱泥淖中挖出來的孟寰和惟帆、忙碌中幫我看稿的毓如。想念你們。最後，謝謝我的家人，你們是除了我自己之外閱讀我那雜亂文稿次數最多的人，你們也是最常承接我的情緒又包容我的人；每當我懷疑自己的時候，幸好有你們沒來由的信任，才支持我走到這裡。謝謝。

doi:10.6342/NTU201903708

中文摘要

本文從孟加拉的加工出口區、都市貧民區、非政府組織等三個場域，分析對於現今在加工出口工廠工作的女性而言，「成為工人」所引發的權利變化。我描述在女性工人連結多重邊緣性的日常過程中，國家和非政府組織的介入與治理，其中涉及的權力關係和運作形式。一方面，性別秩序、工廠管理、都市空間政治、國家發展計畫等支配性力量的交織與競爭，使女性工人基本權益經歷反覆的失落與重構；另一方面，在非政府組織的活躍下，女性工人以更經驗性、脈絡性的方式認知權利，並因應地方權力關係、權威和行政體系而實踐。論文最後我主張，對女性工人來說維護「作為工人」的權益，與成為「更理想的」女性、公民，時而相互嵌合，彰顯主體能動性的多重演繹。

關鍵字：南亞、女工、治理、權利、加工出口區、都市貧民區、非政府組織

doi:10.6342/NTU201903708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rights caused by "becoming a worker" for women working in garment factories from three fields: export processing zone, urban slum,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Bangladesh. I describe the intervention and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and NGOs, as well as the social relations and operating forms of power, which are involved in the daily process of female workers linking multiple marginalities. On the one hand, the compound and competition of dominant forces, including gender order, factory management, urban space politic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s, have caused female workers regularly experience loss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ir basic rights. On the other hand, under vibrant NGOs, female workers perceive rights in a more empirical and contextual way, and practice them in response to local relations of power, authorities,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s. Therefore, at the end of the thesis, I argue that for female workers, striving for basic rights of worker and seeking to become "more ideal" women and citizens are interlocked with each other from time to time, demonstrating the multiple performance of subject agency.

Key words: south Asia, female worker, governance, right, export processing zone, NGO, urban slum

doi:10.6342/NTU201903708

目錄

謝誌 i

中文摘要 ii

Abstract iii

目錄 iv

圖目錄 v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 1

第二節 理論進路 2

一、 在地女性賦權計畫的省思 2

二、 權利與治理 6

第三節 田野地簡介與研究方法 10

一、 田野地簡介：孟加拉當代政治經濟變遷 10

二、 研究方法 13

第四節 章節概述 19

第二章 都市治理與加工出口業女工 21

第一節 前言 21

第二節 都市治理的表現 21

一、 攻擊事件及緊急管制 21

二、 加工出口區設立與侍從主義政治 25

三、 加工出口區的性別意象 31

四、 女性工人的都市居住情境 34

第三節 小結 38

第三章 都市貧民區與公民權利 39

第一節 前言 39

第二節 非法貧民區的女性 39

第三節 都市非法聚落的秩序與危機 45

一、 非法貧民區的自力更生 45

二、 非法貧民區的危機 48

doi:10.6342/NTU201903708

第四節 小結 52
第四章 權利的認識與不滿 53
第一節 前言 53
第二節 權利概念的生成脈絡 53
一、 離開工廠 54
二、 走入工會與勞工非政府組織 57
第三節 工人運動軌跡 59
一、 協商權利 59
二、 國家／跨國家情境 63
第四節 小結 67
第五章 結論 68
第一節 成為工人之後 68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69
參考文獻 70

doi:10.6342/NTU201903708

圖目錄

圖片 1　*Sramik Awaaz* 預告片段 1
圖片 2　達卡加工出口區入口景象 14
圖片 3　國家烈士紀念碑公園景象 15
圖片 4　國家烈士紀念碑公園景象 15
圖片 5　達卡加工出口區內景象 15
圖片 6　達卡加工出口區內景象 15
圖片 7　Awaj 教育課程 16
圖片 8　Korail 位置示意圖 17
圖片 9　Korail 居住景象 18
圖片 10　Korail Bosti 景象 19
圖片 11　達卡加工出口區圍牆外景象 25
圖片 12 孟加拉加工出口區管理局招商廣告 27
圖片 13 工廠內工作間標語 32

doi:10.6342/NTU20190370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

由孟加拉人權律師 Chaumtoli Huq 製作、紀錄片導演 Mohammad Romel 執導，於 2016 年公播的影片《工人之聲》（*Sramik Awaaz: Workers Voices*），以孟加拉成衣加工出口業（當地習稱 RMG，readymade garment industry）工人的日常生活和爭權行動所面臨的阻礙為記錄主題[1]，影片中一位受訪的成衣業工會成員，說出這麼一段話：

> 身為工人有權利，身為女人有權利，身為公民也有權利。但這裡的情況是，成為工人的我們正失去這些權利。

圖片 1　*Sramik Awaaz* 預告片段
（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1uzkEmWmlY&t=216s，2015 年 9 月 6 日上線）

這段話顯示，對影片中主要受訪者而言，「成為工人」會面臨自身權利處境多方面惡化的危機；同時也顯示，在地脈絡中女性、工人等不同「身份」權利，動態地交織構成。那麼，究竟如何理解「女性成為工人後權利處境多方面惡化」的影響層面及意義？成為工人的經驗如何影響女性？在權利的形構過程中，哪些治理想像被實現？這些疑問便成為本論文的初始關懷。

[1] 見報導 Halder (2017) Sramik Awaaz: The Unheard Four Million.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April 17; Mujumdar (2015) Workers' Voices: Documentary Uses Personal Stories to Highlight Women's Leadership in Bangladeshi Garment Industry. *India.com*. Discover April 16.

doi:10.6342/NTU201903708

從上述基本疑問出發，本論文是以孟加拉加工出口工業的女性工人為核心，呈現在首都達卡市近郊工廠工作的婦女，如何連結都市、工廠等不同的勞動空間和情境，建立起生活常軌，進而在回應跨國資本和國家體系的掌握企圖中，成為能主張和協商權利的主體，參與都市地景的形塑。針對這樣的研究關懷，我嘗試由民族誌材料指出：一方面，權利的失落和建構，關乎性別秩序、工廠管理、都市空間競爭等支配性力量的交錯作用與協商過程；另一方面，女性工人持續從不同身份位置擴充對權利的認知、實踐，在各類非政府組織活躍下，帶動締結新關係、中介知識、磋商執法過程，繼而累積權利主體能動性。

下一節我先回顧既有文獻並梳理我的理論取徑。

第二節　理論進路

一、在地女性賦權計畫的省思

孟加拉的成衣及服飾加工業從 1970 年代後期開始發展，迄今已逾四十年。「成為工廠工人」和同時期裡快速成長的「微型貸款（microcredit）計畫」（以下簡稱「微貸計畫」），大幅影響孟加拉社會底層婦女的生活，在跨國女權運動影響下，兩者也成為孟加拉政府以及眾多非政府組織所持的發展論述中，反覆表彰、難以捨去的女性賦權敘事（Kabeer 1991：44-46）。然而，女性賦權計畫和論述的大量、經常性出現，本身意味著甚麼社會性質變化？為何《工人之聲》片中的女性工人，仍然感到權利的多方面失落？

孟加拉人類學者 Dina Siddiqi（1996：85-100）曾指出，受 80 年代伊朗革命及兩伊戰爭的國際現實和政治經濟環境影響，為了維持歐、美等主要市場及投資來源，孟加拉政府有意識地對外傳達「溫和伊斯蘭」、「女性友善」等國家形象，除了成立國家女性事務部（Ministry of Women's Affairs）、調整國會女性議員保障席位、增加女性在政府部門的保障聘用比例，也鼓勵女性進入工廠工作，以因應私有化、全球化市場和提高工業生產力。由始，女性賦權計畫開始在國內蓬勃積累（Kabeer 1991：45；Rock 2001：30）。

然而，在賦權計畫和發展主義所堆砌的榮景下，Siddiqi 指出，快速變遷所帶來的衝擊使得無論在社會制度或意識形態，都面臨巨大撕扯，而女性工人首當其衝，

doi:10.6342/NTU201903708

例如被汙名是「違背了 *purdah*」而造成社會混亂（Siddiqi 1996：3-15）[2]。

purdah 是流傳於孟加拉穆斯林群體的概念。概略而言，其字面義意指以簾幕或隔幔區分「裡、外」空間；有「裡、外」之分的空間再性別化，「裡面的、家庭的、私密的」是適合女性的理想空間，再引申出隔離、遮蔽、界線、掩飾等概念，成為對女性衣著、行為舉止、空間移動、職業選擇、與非親屬異性互動接觸等各方面行為的評價義理，也發展出階級化的意涵（ibid.：142-154）。Siddiqi 更指出，汙名壓力被納入工廠規訓體（disciplinary regime），女性工人行事以「如何最大程度減小汙名傷害」為考量，工廠也以此建構「理想工人」模樣：成為一個好工人符合 *purdah*，是好女人的品性；要避免被非議是不好的女人，在工廠中就要努力成為更自律的工人（ibid.：199-200）。

在 Siddiqi 的觀察中，女性工人對於 *purdah* 的實踐方式，其實存在分歧而豐富的解讀，顯示工人的異質性；不過關於能否維持「尊嚴」、「隔離」、「內斂」，則被多數人看重，尤其表現在女性工人對於工廠管理要求的理解和應對上（ibid.：162-171）。

> 女性工人苦惱於如何當好一位「在外工作的女人」，這指的是，她們關注如何維持自己和家族榮譽、取得公正待遇及合理薪資，大於關注如何串連、發起工人階級行動。（Siddiqi 1996：221）

有別於同時期流行的「透過掌握經濟資源以改善其他生活領域」論述取向，Siddiqi 對於早期成衣加工廠及女工的研究，認為女性工人將作為女性的日常生活和工廠運作疊合，工廠也挪用性別表徵來合理化對女性工人的管理要求；工人對勞動剝削的感受，經常表述為「沒有被當作一個有尊嚴的女性來對待」，以及頻繁地使用公平、榮譽、責任等相關詞彙。她因而突顯出，工廠勞動經驗與在地性別表徵、女性主體相結合的面向。在她的後續研究中，另一個別具意義的例子，是在成衣加工業的勞權抗爭場合，出現「金色女孩（golden girl）」這樣的女性工人自稱，透過擷用國歌歌詞中「金色孟加拉（golden Bangladesh）」的意象[3]，召喚國族表徵，突

[2] Siddiqi（2000）認為這種對女性工人的指責，也反映出當時社會上男性的一種集體挫折感，以及新性別樣態形成當中。

[3] 「金色孟加拉」的國族意象，源自於國歌作詞者 Rabindranath Tagore，對過去盛產黃麻的孟加拉

doi:10.6342/NTU201903708

顯女性工人的社會貢獻（Siddiqi 2009：164-167）。

從面對污名作用，到運用「金色女孩」這樣彰顯國族和籲求公民價值的自我肯認稱呼，顯示樣板化的賦權敘事，不僅將簡化女性工人的主觀意識，也會忽視相關社會運動基調的變化。同樣地，另一項賦權敘事主題「微貸計畫」也有類似的窘迫。

與眾多婦女成為都市工廠工人幾乎同一時期，許多鄉村地區女性的生活，因微貸計畫而經歷重大變化[4]。社會學者 Sarah White 認為，相較於工廠勞動來說，微貸計畫對於女性的 *purdah* 實踐影響較小，但卻引起更多地方上的教令（*fatwas*）[5]爭議，主要原因應在於工廠多數集中於都市新興開發帶，而微貸計畫則深入鄉村地區，介入地方權力關係（White 2012：1440-1441）。White 的看法，與人類學者 Lamia Karim 對微貸的研究，可以相互映證。

Karim（2011）的研究說明，微貸計畫最初的設計，是為了打破主流金融體系對貧窮者的貸款限制，透過所謂的鄉村銀行（Grameen Bank），提供婦女小規模創業所需資金。此實驗性概念被提出後不久，便吸引眾多國內、外非政府組織的關注，隨後在孟加拉鄉間開始大舉推行。微貸發行機構的工作人員深入鄉村，鼓勵婦女加入計畫。然而，在追蹤參與者的經歷後，Karim 認為，微貸計畫所奉行的宗旨，即「通過貸款協助女性經濟自立而擺脫依賴者地位，不僅能使她更有能力照顧家戶，也能改善她在家戶及社會中的地位」，因過度簡化社會情境，從而衍生無數爭議。

首先，在貸款運用情形上，儘管許多微貸機構明示「針對女性放貸」，實際上很大比例的款項卻是由貸款者的男性親屬來掌理，真正直接用作女性自行創業準備者，集中於少數獨居、離婚、喪偶等必須獨力負擔家戶經濟的女性。第二，在創業風險評估上，微貸機構鼓勵貸款者購買由其提供的種子、雞仔、乳牛、營養食品、手機等實物以進行創業，卻並未輔助貸款者維繫足夠市場觸及度和風險承擔力，造成經營失敗的比例高於評估。第三，在監督機制上，開辦微貸項目的機構多缺乏適當監督機制，財務不透明，更有不少被揭露利用貸款綑綁商品以不當牟利的案例。

三角洲郊野景象所作的歌詠。

[4] 現今孟加拉國內最著名、提供最高額度微型貸款的機構，分別是 Grameen Bank（創辦人為 Muhammad Yunus）及 BRAC（創辦人為 Fazle Hasan Abed）。兩位創辦人都曾表示，機構的成立契機與 1974 年大飢荒有關（N. Hossain 2018：6）。

[5] 指由伊斯蘭學者對於伊斯蘭教法議題作出的宗教性詮釋，也就是教令。教令的約束力在伊斯蘭不同派別、不同地域的實踐中均相當大的差異。

doi:10.6342/NTU201903708

最後，是對社會關係的衝擊上，借貸關係使資金豐厚的微貸機構、實際執行放貸的機構代理人、借貸者等三方，形成新的權力階級關係，隨著微貸計畫在鄉間迅速發展，擾動地方資源分配機制[6]，即使有正面影響，但所引發的負面爭議後果，多由借貸者承擔而鮮少溯及微貸機構。

Karim 的研究挖掘微貸金流所捲動的地方關係，對於其依附的賦權論述提出批判，並總結道，以微貸為主題所實行的新自由主義邏輯發展計劃，著重於引入資金，卻未審慎對待資金轉作其他形式在地方流轉，使眾多參與計畫的女性由「貧窮」落入「負債」危機，背離計畫所承諾的願景（Karim 2011，2014）。

Siddiqi 和 Karim 分別檢視工廠勞動和微貸計畫兩項關於孟加拉底層女性賦權的重要主題，從兩者的研究顯示，側重個體經濟能力擴充或父權協議（patriarchal bargain）下的女性賦權計畫，終究會形成巨大偏誤和限制。在一篇回顧在地女性賦權計畫的文章中，政治社會學者 Naomi Hossain（2018）提出藉由檢視女性和國家的關係，來反思賦權計畫。她以 1971 年獨立戰爭和 1974 年的大饑荒為例，指出在這些事件中，與男性家戶長地位緊密相關的「提供照護、安全」責任，很大程度由國家介入或取代，從而突顯國家治理中的性別，而其對性別秩序的影響需要被重新審視。

Hossain 指出，在 1971 年獨立戰爭中遭受性暴力的女性，雖然很早就被賦予「國家英雄」的地位，然而在這樣性（sexuality）與創傷都持續被「國家化」的過程中，不僅個人被抽離，社會性別反思的層次更無法開展。而在 1974 年發生的嚴峻大饑荒，導致大量家庭崩解流離，使得更多女性為謀生而加入遷移，必須獨力維持家戶經濟的女性人數也大增，如社會學者 Shelly Feldman 所記錄的第一代成衣加工業女性工人對自我的看法：「如果我的丈夫、家族、村里都沒辦法支持我生存，又有甚麼理由阻止我工作？」（Feldman 2001：1115，引自 Hossain 2018）[7]。飢荒使大量鄉村人口從土地剝離、向都市遷移，以致政府、都市菁英、非政府組織等無法再置身事外，對於「女性的工作權應該受重視並以政策保障」的呼籲，在此氛圍

[6] 孟加拉經濟學者 Nalia Kabeer（2005：16）指出，微貸計畫的推廣在孟加拉部分地方，使貧民對地主的依賴關係減弱。

[7] 對照其他學者的研究，因 1974 年大饑荒而流亡的婦女，除了有部份成為第一批進入成衣加工廠工作的工人，另一主要部份則加入政府的「以工代賑（Food for Works）」基礎建設工程（Hossain 2018；Hossain, Jahan & Sobhan 1988：111-112；Siddiqi 2000：L-12）。

doi:10.6342/NTU201903708

下拔高；而為了能在全國順利施行人口安置措施（參考註 4），非政府組織也開始累積各式人口統計資料，許多調查工作領先官方，奠定日後非政府組織與鄉村地區的緊密連結（Hossain 2018：6；Karim 2011）。

以上述兩例為引，Hossain 分析性別關係所牽涉的生命權力與國家治理。承接前段所述與「成為工人」和「微貸計畫」相關的在地女性賦權計畫實踐過程，顯示出在發展主義主導下，缺乏對權力關係、國家治理動態的考慮，也缺少對這些脈絡下女性權利主體更立體的認識。因此，下一小節我嘗試從南亞研究中追索「權力關係」及「權利」概念的轉變。

二、權利與治理

印度政治學者 Partha Chatterjee 主張，現代國家對不同人口（population）採取不同治理術，形成不同政治可能空間（Chatterjee 2004：35-36、60）。以印度為例，所謂「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是相對有限的概念，往往僅涵蓋都市中產階級和富有農人，他們主動而積極地影響國家治理，也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被視作推動獨立後國家發展的主力；與之相對的，是被排除在公民社會之外，不被認為具有重要影響力、主要來自鄉村或都市底層的人口，Chatterjee 認為他們組成了「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ibid.：38-40）。

> 然而，國家機構和非政府組織也無法忽視他們，畢竟有無數這樣的人口群體，他們的生活環境或生存本身就牽涉非法。……對這些群體來說，他們並不否認所作所為是非法、有違良善風俗，但他們對於居所和生存而提出的要求，仍應該被看作是基本權利問題。（ibid.：40）

在 Chatterjee 看來，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的隔閡，表現在國家機構透過福利制度，將政治社會成員與國家維繫在一種效益評估取向的「照看」關係，因此相對於公民社會，政治社會通常是遊走在法律邊緣安排或協商自身權利，包括和公民社會建立各式連結關係；其參與政治的目的是以有限資源謀求生存，而不是競爭對國家機構的掌控或領導。如此一來，一種有限而不穩定的政治空間得以開啟，使非公民社會成員得以從國家機制運作中獲益（ibid.：56）。

doi:10.6342/NTU201903708

> 在像印度這樣的國家，國家法律機制無法到達一片巨大的社會實踐領域，這片領域一直被其他信念調節、受其他權威治理。但是……這些地帶正在被現代國家所實踐的福利制度穿透。（ibid.：50）

Chatterjee 認為，政治社會的存在顯示了印度的民主政治體質。從殖民時期的民族主義政治動員，就持續在現代性規範價值和滿足群眾需求的道德主張之間，進行著變動和妥協。政治社會的活躍表現，在 1980 年代後又經由兩種形式彰顯：一是在強調人口福利和保護制度的治理術，認為國家有義務為非公民社會共同體成員提供基本生存利益；二是以民主選舉機制為主要考量下的政治動員擴大、增長，納入例如宗教集會、文化節日等較不明顯屬於專門政治溝通的組織（ibid.：41、47）。

> 顯然，在推進底層屬民（subaltern subjects）成為國家公民（citizens）的過程中，現代化的設計者遭遇到來自於政治社會活動而產生的抵抗力量。但是，我所要強調的是，底層階級在因應強勢的現代化計畫時，走上一條內部轉換之路……同時，現代化設計者在實現其對政治社會的使命過程中，也同樣轉化他們自己。（ibid.：51）

Chatterjee 對印度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的探討，除了受底層研究學術群影響，也延續他對獨立後印度社會同時經歷現代化計畫與民主計畫的觀察。同樣關注「非公民社會如何行動」的問題，但不同於 Chatterjee 採取的公民社會／政治社會二分架構，人類學者 Aradhana Sharma 嘗試從賦權計畫本身著手，探討底層社會治理的動態性質。

Sharma 對印度賦權倡議（empowerment initiatives）的研究，首先是主張，賦權計畫是社會運動者、非政府組織、官僚體系等不同行動方交涉的場域。她研究一個自 1989 年開始，在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古吉拉特邦（Gujarat）和卡納塔克邦（Karnataka）等地鄉村，所實施的大規模女性平等教育計畫（Mahila Samakhya，即 Education for Women's Equality），是印度政府首次和民間女權倡議團體合作，成立專責組織負責執行的計畫（Sharma 2008，2010）。在 Sharma 看來，這樣的編制固然對計畫執行者而言，能兼具民間組織的操作彈性和官方機構的觸及度與公權力背書，但也導致行政規訓系統的擴大（Sharma 2010：76-77）。

doi:10.6342/NTU201903708

Sharma 認為，賦權計畫作為一種新自由主義治理術，充滿風險和未定，與計畫「並行的其他政治安排、行政階層體系、歷史情境、倫理論述」（ibid.：72），經常才是界定治理性的關鍵，如 *Mahila Samakhya* 這樣的賦權計劃，究竟使參與對象「去政治化」、「再政治化」或其他介於兩者之間的可能，就很大程度取決於計畫執行過程。她也指出，當印度各類賦權計畫趨向「官僚化、階層化、職業化」（ibid.：85），應將國家視為權力關係的發生場所（*loci*），關注行政體系運作下參差的國家表現，以及賦權計畫中不同政治能動者的生成及隱沒，才能不輕易陷入「公民社會相對於政治社會、公民社會相對於國家、賦權相對於治理」等對立性思考（Sharma 2008：xx-xxii）。

除了 Sharma，人類學者 Veena Das 也開展有關都市貧民主張權利的思辨。她認為，「無論是治理者與被治理者、合法與非法、道德群體與受治理形塑的人口、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菁英民主與大眾民主」，應該要整合上述二元、整合人的生理生存與社會生活的發展，才能重新再生成權利概念及主張權利的立場（Das 2011）。為了進一步論證這個觀點，Das 檢視國家、法律、生命三者的關聯和相互作用，包含對「例外狀態」的討論。

首先關於法律與生命，她認為法律有兩面性，即工具性層面和建構性層面。工具性層面是指法律對社會關係的約束力，也就是所謂的「法律效果」，與其他社會規範效果有明確區別，這樣的法律是「片段、人為、侵入性的」。建構性層面是指法律建構主體和社會關係，主體已然內化法律，僅能從社會關係追蹤法律的痕跡，此時法律的存在基礎，並非來自能界定合法性的「法律效果」，而是來自於法律主體之間對生命（life）的主張和互動。

從法律的建構性延伸，當生命成為國家管理的對象，也形成對身體與健康的權利主張，而法律上的生命概念，不僅是針對生命的「生理生存」，更是指「生命形式（form of life）的延續」，奠基於社會傳統和制度（ibid.：321）。換句話說，在法律與社會傳統習俗的複雜關係中，生命政治（politics of life）表現在生命必然寓居於關係性的社會生活中，生理生存（exist）與社會生活（lived）相互吸納後構成日常；法律是日常生活經驗的抽象化，除了表達對生命的理解，也倚賴日常理性和關係網絡來運作。就此而言，法律的工具性和建構性其實相互滲透（ibid.：321）。總結來說，Das 認為從「單純存在的生命」到「建立好的生活」，即屬於生命政治的內容。

doi:10.6342/NTU201903708

在法律的常態之外，另一方面，藉法律剝除生命的社會成份，使生命成為「裸命（bared life）」，則是阿岡本所論由主權決斷的「例外狀態」，如此「棄置」其實是使生命受到主權的完全管轄（ibid.：322-323）。然而，Das 提出，在印度古籍《摩奴法論》中描述，當戰爭、飢荒或其他使秩序毀壞到難以恢復程度的情況發生時，一些社會禁忌將被暫時解除，例如可以食用某些食物，以作為補償和救贖。這些補償方案有條件地依身分地位適用，既確保秩序得以恢復，又鞏固既有社會階序，同時阻止了阿岡本所謂「裸命」的發生。換句話說，Das 認為以印度的法理概念來說，其實涵蓋更多「替代」和「補償」而不是「裸命」的邏輯；「如何遵守」法律的可議性極可能大於法律內容（ibid.：323）。

由具有「替代」、「補償」邏輯的法律觀，形成一種「遞增的權利（incremental right）」形式，構成都市貧民主張權利的基礎，Das 對於法律及其所生成社會文化脈絡的理解，我認為可以在另一位人類學者 Jonathan Anjaria 的孟買研究中得到進一步闡釋。Anjaria（2016）研究印度孟買的街頭小販，如何在都市治理規範中主張他們的空間使用權，相關行動有如：共用有限的攤攤執照；以合法的工會組織和遊行抗議來與政府協議，使擺攤區合法化；向執行驅趕任務的警察對小費（*hafta*）討價還價。小販和執法者之間所達成的共識，不是以「合法／非法」來乾脆劃分；小販也與商家、人力車伕、都市中產住宅社區，發展出共生關係和日常行動倫理，這些關係和行動倫理都讓小販在都市治理地間隙斬獲更多棲身可能性。

Anjaria 認為，孟買的都市空間政治中不只有小販在想像與行動，都市中產階級居民、組織運動者、政府機構、執法官員也都參與其中，他們之間的關係，即使有明顯的權力主、被動方，卻沒有誰能成為單向主導者，例如他所記錄的一個例子：1990 年，孟買市政府展開一項對街頭小販的普查，以便遂行更有效的控管。但普查計畫遭遇來自低層執法人員的杯葛，多於來自小販；因為有不少低層執法人員認為，這項調查會損害他們和小販之間的長期協商利益以及他們對小販的影響力；反觀來說，小販們則是認為這樣的調查有助於他們取得「部分合法性」，甚至在 2003 年一次針對設立合法擺攤區的法庭辯論上，這項調查還被小販工會視為有利的論證資料。

最後 Anjaria 主張，從想像到實踐過程都參差不齊的都市空間，有關都市公民身份的法律界限，該訂定甚麼樣的目標、以誰的想像為優先藍圖，一直充滿偶然性和協商性。繼而，新自由主義的掠奪式積累，實際上也因遭遇這樣的地方治理脈絡，

doi:10.6342/NTU201903708

而產生多層「黏滯」。我認為，對於微觀權力運作和「日常國家（everyday state）」的關注，使他得到與 Sharma 相似的結論，即國家並非一個超越實體，或受一致的理性邏輯支配；國家的客體性應該被視為一種「結果」而非先驗存在。對於法律，應檢視所埋藏的脈絡，和落實過程中那些被淡出或潛藏的異質部分，而不只是法律內容（ibid.：32）。

本節我整理關於孟加拉在地女性賦權計畫的省思，並從南亞文獻中對於底層社會政治、法律、治理之間動態關係的爬梳，探討都市貧民權利主張的基礎。我認為，關於孟加拉成衣業女性工人所經歷的權利破碎化，需要從她們所處的國族建構情境、法律灰階性質、都市空間政治，以及 Das 所闡釋的「遞增的權利」概念，才能還原她們的主體能動性。

下一節，我將介紹本論文的田野地與研究方法，並概述各章內容。

第三節　田野地簡介與研究方法

一、田野地簡介：孟加拉當代政治經濟變遷

（一）從東巴基斯坦到孟加拉國

從地理來看，今日的孟加拉國（People's Republic of Bangladesh），與印度的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東北各邦的局部地區，共同位於由恆河（The Ganges River）和布拉馬普得拉河（The Brahmaputra River）兩大河系共同沖積而成的低窪平原，即「孟加拉三角洲」（The Bengal Delta），形成一個有特殊歷史意義的地理範圍。三角洲地區的人們以孟加拉語（Bengali）為主要流通語言（Schendel 2009：13-15），早在十二世紀左右，伊斯蘭教首先以蘇菲教團的形式傳入此區，至十五世紀時，多數三角洲居民已成為穆斯林（ibid.：24-38）。

因瀕臨孟加拉灣（The Bay of Bengal）、有著方便的連接口岸，十六世紀時孟加拉三角洲一帶已發展成南亞大陸上人口稠密、商貿網絡繁盛的地區之一。十八世紀中葉，當英國在南亞大陸展開殖民事業時，三角洲的主要城市──加爾各答（今屬於印度西孟加拉邦），成為第一個殖民治理中心。直到十九世紀中，殖民政府將治理中心轉移到現今印度德里，孟加拉三角洲地區則設置英屬印度（British India）「孟加拉省」（The Bengal Province）（ibid.）。

孟加拉三角洲地區在現代統治者地圖上的第一次正式分裂，是在 1905 年，由

doi:10.6342/NTU201903708

當時的英國殖民政府號令，將此區劃分為東、西兩部份以利其殖民統治事業。此命令最終因遭遇強烈抵制而在 1911 年被取消，但在強制推行分治的過程中，已然加深地方社群的分化，尤其是宗教社群主義的浮現和動員（Menon & Chatterjee 2010：77-104；Schendel 2009）。1947 年，印度、巴基斯坦自英屬印度獨立，孟加拉三角洲地區也被正式分為兩部份，穆斯林人口比例較高的三角洲東邊地區劃歸巴基斯坦，時稱東巴基斯坦（也就是後來獨立的孟加拉國）；相對印度教人口比例較高的三角洲西部，則劃入印度領土（也就是現今的印度西孟加拉邦）。

巴基斯坦治下，東巴基斯坦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受到以伊斯蘭馬巴德為統治中心的政權所壓制，獨立建國的意識在面臨種種不平等待遇的情況下越趨強烈。在分化與懷柔策略無果後，終於在 1971 年 3 月，伊斯蘭馬巴德政府單方面宣布東巴基斯坦地區實施戒嚴，獨立戰爭於此點燃。歷經為期九個月殘酷、混亂、多方外國勢力干涉的戰事後[8]，同年 12 月，孟加拉人民共和國宣佈獨立，隔年 1 月宣布施行憲法（Schendel 2009：105-190）。

（二）從社會主義經濟到私有化經濟、從世俗主義到伊斯蘭國教

獨立後施行的憲法，明定以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世俗主義和民主制度為共和國的立國原則（Feldman 1998；Schendel 2009：174-176）。然而行憲不到五年，原先在獨立戰爭期間大獲民心、並在獨立後取得首次執政機會的政黨——孟加拉人民聯盟（Bangladesh Awami League，簡稱 AL），因未能使戰後的民生物業得到妥善恢復、無法兌現獨立戰爭前對農民的承諾，且獨立後經濟資源依然被軍系要員、戰爭中得勢的政客和商人集團、從殖民時代遺留的官僚集團等把持，再加上 1974 年發生的水患和飢荒災情慘重，與軍方各派系的協調破局，種種原因導致 1975 年的軍事政變，人民聯盟領袖、也是獨立後首任總理謝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及其大部分家人遭殺害。這場政變後來以時任陸軍參謀總長的齊亞・拉赫曼（Ziaur Rahman）於 1977 年出任總統而暫時落幕。齊亞・拉赫曼與 1983

[8] 孟加拉獨立初期，僅獲得印度、蘇聯等國的支持，多數歐、美及阿拉伯地區為主的伊斯蘭國家在當時拒絕對初獨立的孟加拉提供協助（Feldman 1998：38-39）。出於削弱巴基斯坦、聯合蘇聯等冷戰情勢下的地緣政治考量，當時印度政府除了庇護孟加拉流亡政府、軍事領袖，還供給武器給在東巴基斯坦境內游擊作戰的「自由戰士」（the freedom fighter）。

doi:10.6342/NTU201903708

年也以政變上台的侯賽因・穆罕默德・艾爾沙德（Hussain Muhammad Ershad），標誌著孟加拉進入一段長 15 年的軍人獨裁統治時期。

在軍政府掌權的十逾年間，推行經濟私有化和復興「伊斯蘭生活」。獨裁者企圖透過選舉制度和宗教力量來確立權力合法性，除了成立政黨、積極爭取國內穆斯林群體的認同，也重視維護與穆斯林國家的關係，並因此在外交資源上獲益，後來更修憲確立伊斯蘭教的國教地位（但仍保障個人選擇宗教的自由），並開放合法組織宗教性政黨。這些變革產生長久影響，一改獨立初期憲法標舉的四大原則。不過，有學者認為，從 1976 年將「世俗主義」從憲法中消除，到 1988 年正式在憲法敘明伊斯蘭教的國教地位，這個整體上看似由政府嘗試自上而下帶動的「伊斯蘭化」過程，是「反覆猶豫、小心翼翼且程度不一的」（Kabeer 1991）。另外有研究指出，當追求私有化、自由化的經濟政策快速發展，使廣大鄉村地區經歷嚴重的土地與人力流失，宗教組織在社會劇烈變遷過程中，在鄉村地區從事物資發放、勞務轉介、安置教養等工作，發揮相當大的社會安定作用，也間接促使宗教性政黨茁壯（Feldman 1998：44-46；Shehabbudin 2008）。

1980 年代後期，在一次次激烈的民主化改革運動下，終於在 1991 年修憲恢復議會民主政體，睽違經年的民選國會議員再度上任，由齊亞・拉曼的遺孀、當時的民族主義黨（Bangladesh National Party，簡稱 BNP）黨魁卡莉達・齊亞（Khaleda Zia）出任總理。然而，雖然在議會民主化改革下出現許多政黨，實際政局卻陷入由謝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 Wazed）所領導的人民聯盟，和卡莉達・齊亞領導的民族主義黨，兩黨輪流執政的膠著中。兩黨較勁下，主張伊斯蘭主義的政黨獲得成長機會，在狹窄化的政治論述中強化「伊斯蘭」作為政治話語的動員力（Karim 2011；Rock 2001；Schendel 2009：197-201）。不少評論家、分析家指證歷歷，無論是人民聯盟或民族主義黨，兩黨在檯面下均與激進宗教性團體保持互動（Karim 2011）。政黨因各自盤算而使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之間的隔閡加深，甚至暗中資助激進宗教團體、提高社會對立，因政治不安而引發的暴力衝突事件一度在 2013 年達到高峰[9]。

[9] 人民聯盟自 2008 年第九屆議會選舉勝出取得執政權後，所推動的重要政策之一便是堅持對 1971 年獨立戰爭戰犯的究責。2013 年 12 月孟加拉伊斯蘭大會黨（Bangladesh Jamaat-e-Islami）領袖之一阿布杜拉・卡迪爾・莫拉（Abdul Quader Mollah），便是第一位以在戰爭期間犯下屠殺罪

doi:10.6342/NTU201903708

1970 年代中開始，在公共政治領域、各種以國家為話語表徵的場合、政策和法條，都可見到伊斯蘭日漸佔領公共空間的事實……到了 1990 年代中，伊斯蘭象徵和習語已成為與日常政治貼身的一部份。（Siddiqi 2006：2）

2019 年 1 月，在過程充滿爭議的第 11 屆國會選舉結束後，人民聯盟在民主化改革後第三度取得執政權，越來越赤裸顯露獨裁化傾向的謝赫·哈西娜續任總理[10]。

在這一小節，我爬梳孟加拉當代政治經濟發展，雖然未深入探討宗教表現，不過已可觀察到，伊斯蘭不只作為信仰，還牽涉國家的意識形態根基；再現於律法機構、政黨政治，也深入民間知識和日常倫理，涉及對行為舉止是否合宜的原則。即使現今孟加拉全國 85%以上人口是穆斯林，宗教實踐仍然相當複雜多元，不同身份淵源的穆斯林之間（例如使用烏爾都語〔Urdu〕的穆斯林和使用孟加拉語的穆斯林）、穆斯林與不同宗教信仰社群和族群之間，都仍持續摸索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協作共存。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材料主要蒐集於 2016 年與 2017 年間的兩次田野調查，時間總長共約五個月，主要在女性工人活躍的三個地點進行，即達卡加工出口區、達卡市的 Korail 貧民區、非政府組織 Awaj Foundation 的達卡辦公室，涉及了工作、居住與集會等場所；除此之外，我也依需要進行不固定點的約訪。兩次田野調查的時間，分別是 2016 年 7 月到 9 月，以達卡加工出口區為據點；2017 年 7 月到 9 月，以

刑處以絞刑之人，他的死刑引發反對人士發動暴力抗爭，激化社會中的對立意識，流血衝突引起國際人權觀察組織關注（Human Rights Watch 2013）。自那時起，陸續有抗議伊斯蘭教勢力過度干預政治的部落客、作家、出版業者、大學教授，收到死亡威脅或人身攻擊，被攻擊者名單在不久後，甚至擴及同志運動者、宗教少數群體的神職人員（包含天主教、印度教、佛教、什葉派穆斯林和蘇菲教團）及外國志願工作者。截至 2016 年達卡事件發生前，3 年間總計被揭露的個別傷害事件超過 40 起（Riaz 2016，2018）。

[10] 見報導 Star Online Report (2018) Dhaka Sees Peace; Violence Elsewhere.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December 31.

doi:10.6342/NTU201903708

Awaj 基金會及 Korail 貧民區為據點。

材料蒐集方式包含非正式訪談、正式訪談和參與觀察，主要對象為女性工人、非政府組織幹部、台商會長、台資企業幹部與孟籍員工，其他輔助對象有孟加拉語言中心教師、當地大學生。由於多數工人是以孟加拉語來溝通，所以在必要時聘請翻譯協助進行訪談。我也盡可能蒐集當地英文媒體資料來輔助，並且在第二次田野調查時，在達卡市的一間私人語言中心學習基礎孟加拉語。

以下分述三個主要據點的田野工作概況。

（一）達卡加工出口區（Dhaka Export Processing Zone [DEPZ]）

圖片 2　達卡加工出口區入口景象（來源：作者攝）

2016 年，我在一間於達卡加工出口區設廠的臺資企業邀請下，進入區內進行研究，該工廠的員工成為我最初接觸的當地工人。田野期間，我住在工廠的幹部宿舍，以該廠的臺籍主管、中國籍幹部、會英語的孟籍員工為主要接觸對象。

達卡加工出口區於 1993 年開始正式營運，是全國第二個加工出口區。與第一個加工出口區所在地吉大港市（Chittagong）不同，達卡市並沒有港埠區位優勢，但作為全國首要都市，是政治、工業、貿易指標，吸引人口匯聚。目前在達卡加工出口區內的 104 間工廠中，只有 23 間是本地獨資，其他為外資或合資，顯示本地企業進駐比偏低（BEPZA 2017）。

現在達卡加工出口區分為新、舊兩區，總佔地約 361 英畝（146 公頃），區內共有 104 間工廠，包含 1 間廢水處理廠和 1 間發電廠，另外 70%的工廠是生產紡

doi:10.6342/NTU201903708

圖片 6　達卡加工出口區內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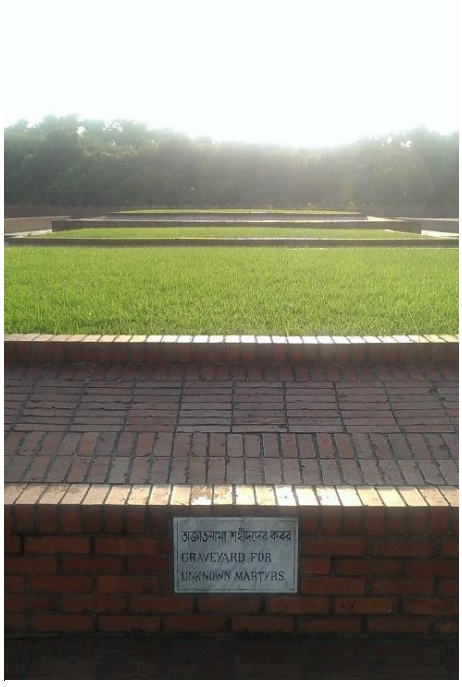
（來源：作者攝）

圖片 5　達卡加工出口區內景象

（來源：作者攝）

圖片 4　國家烈士紀念碑公園景象

（來源：作者攝）



圖片 3　國家烈士紀念碑公園景象

（來源：作者攝）

織、成衣與服飾相關產品[11]。加工出口區內及周圍地帶，不時可見排水道中五顏六

[11] 依生產產品區分，成衣及成衣輔料 56 間、紡織 16 間、針織及其他織品 5 間、鞋類及皮革製品

doi:10.6342/NTU201903708

色的廢水，冒出熱氣和刺鼻味（圖 3、4）。區內設有一間醫院，有正式區內工作證的人員可免費就診。在區外，幾間學校、清真寺與加工出口區比鄰，附近有一些住宅區、俱樂部，限定派駐工業區的外籍主管、廠長、政府人員居住和活動。這些地方的外觀環境通常整潔、安靜，與鄰近工人居住的棚屋區有明顯區隔（2016/07/15 田野筆記）。距離加工出口區約 5、6 公里處，有一座紀念獨立戰爭的國家烈士紀念碑公園（National Martyrs' Memorial），是員工假日為數不多的休憩地點（圖 5、6）。

（二）Awaj 基金會（Awaj Foundation）

圖片 7　Awaj 教育課程

（來源：Awaj 基金會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awajfoundation.org/photos，2017 年 12 月 10 日上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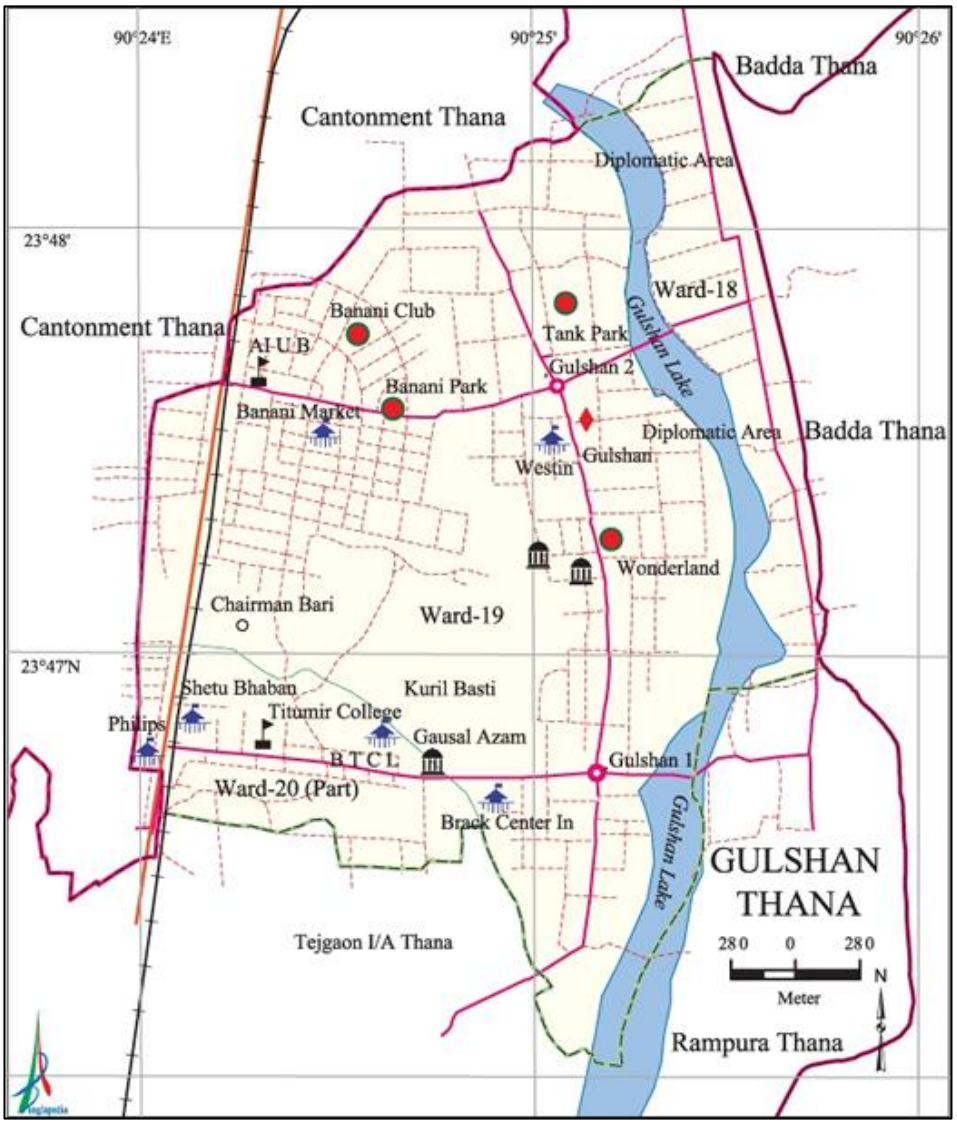
Awaj 基金會是一個創立於 2003 年的孟加拉在地組織，創辦人名為 Nazma Akter，基金會的成立宗旨是推動工人權益的提升，目前已有超過 4 萬名登記會員。在田野調查進行期間，基金會的核心工作包含與醫療組織合作提供醫療服務、開設勞工

5 間、帽類 2 間、家用工具和設備 6 間、塑膠製品 3 間、金屬製品 2 間、化工 2 間、化肥 1 間、紙類印刷品 1 間、光學產品 1 間、電子和電器設備 1 間、能源工業 1 間，另有廢水處理廠、電器檢測廠各 1 間（BEPZA 2017）。

doi:10.6342/NTU201903708

權益教育課程、協助工會談判、提供法律諮詢等。我在 2017 年八月中旬開始拜訪 Awaj 在達卡的總辦公室，在五次的拜訪中，觀察了培訓課程及義診，並在基金會職員的翻譯協助下，訪談前來參加課程和尋求醫療服務的女性工人。

（三）Korail 貧民區（Korail Bos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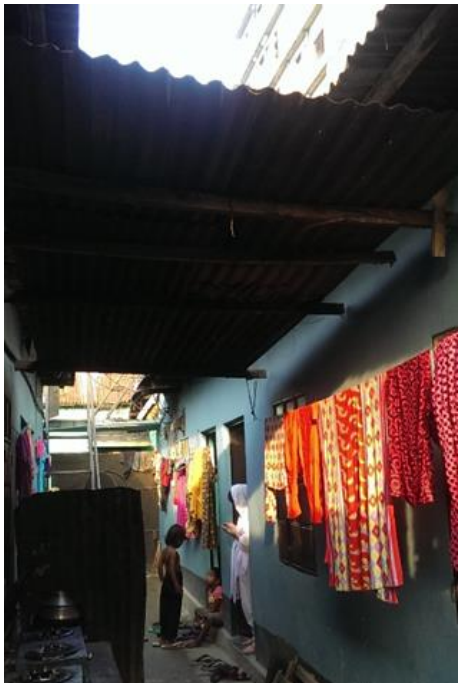
圖片 8　Korail 位置示意圖
（來源：Banglapedia，http://en.banglapedia.org/index.php?title=Gulshan_Thana，2014 年 6 月 30 日上線）

Bosti 在孟加拉語原意指「人群聚居處」（settlement、neighbor-hood）。在達卡，人們使用這個字來指稱都市貧民形成的聚落，大多屬於非法佔地。據 2015 年的一項官方統計，在人口達 1,400 萬人的達卡地區（Dhaka District），約有三分之一人

doi:10.6342/NTU201903708

口居住在大大小小的 *bosti*（Bangladesh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5：21、31）。

Korail 是達卡市內人數最多且仍持續增加、佔地也最廣的 *bosti*，範圍約同於兩個 ward[12]。實際居住人數各方說法不一，保守估計約 10 萬人。我在 2018 年九月下旬密集造訪 Korail，每次都偕同一位翻譯隨行，也經由她的牽線結識第一位當地報導人 Sohail，再經由 Sohail 認識他的妻子 Maya 和其他居民。



圖片 9　Korail 居住景象（來源：作者攝）

孟加拉貧民區內常見的居住型態，是一個家戶住一個面積約平均 2、3 坪的單間，5 到 10 個單間共用一套廚具、淋浴間、廁所（圖 9）。Korail 區內有兩個主要集市（*bazar*），Sohail 和妻子 Maya 的家鄰近其中的 Bou Bazar。Bou Bazar 是區內公共活動的主要空間，也是孩童日常遊戲、居民消磨時間的地方，Sohail 所創辦的發展基金會辦公室也在 Bou Bazar 廣場邊。廣場其中一側，有一所由該基金會募資、即將完工的小學。圍繞廣場有奶茶鋪、水果攤、小吃攤、雜貨店、藥房、裁縫店、理髮店，有些店鋪的所有人並不居住在 Korial。

[12] ward 是孟加拉最小的行政區劃單位，每個 ward 可以選出一位代表（Ward councilor），每三個 ward 再選出一位女性代表，共同參與市政會議。目前 Korail 所在地屬於北達卡市政府（Dhaka North City Corporation），之下分為 36 個 ward、有 48 位代表（Dhaka North City Corporation 2016）。

doi:10.6342/NTU201903708

因與達卡市內主要政府機構聚集的 Gulshan 區、有繁華商業街的 Banani 區比鄰（圖 8、10），Korial 居民的工作幾乎都與這些高所得區密切相關，如擔任人力車夫、司機、粗工、家務工、船夫、警衛、流動小販，以及鄰近工廠的工人。

現有文獻中記錄到，Korail 所在地方原是私人所有土地，在 1961 年，這裡約 180 英畝（73 公頃）的土地被指定給當時的國家電信部（Pakistan department of Telephone & Telegraph [T&T]）[13]。孟加拉獨立後，T&T 於 1990 年將其中的 90 英畝（約 36 公頃）轉手給孟加拉政府公共工程局（Public Works Department [PWD]）。但原地主認為這樣的處分有違獨立前立下的協議，不予承認，因而形成 T&T、公共工程局、原地主三方各有部分地權的情況。到了 1990 年中期，整個地帶因管理權模糊，成為 T&T 附屬部門員工、地方幫派（*mastaan*）、官員各自瓜分、據為己有的地段，這些人再各自把土地或建物出租，逐漸形成 Korail 現今的規模和樣貌（Mridha et al. 2009：18-19；Sinthia 2013）。

圖片 10　Korail Bosti 景象（來源：Abu Hayat Mahmud，*Dhaka Tribune*，2016 年 11 月 21 日上線）

第四節　章節概述

本論文嘗試提供一個對於孟加拉女性工人權利視野的理解，我認為，這需要連結到女性工人的都市生活軌跡，連結起多重邊緣性的日常，且涉及女性工人自身知

[13] 孟加拉獨立時，此部門分裂為兩部分，在巴基斯坦的部份後來轉為國營通訊公司（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NTC]），在孟加拉的部份，則成為孟加拉通訊公司（Bangladesh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Limited [BTCL]），現今公司的民間持股比例已高於官方持股。

doi:10.6342/NTU201903708

識的累積和應用；除此之外，我也嘗試分析在這些過程中，國家和非政府組織的治理及介入，和女性工人累積協商權利的能動性。

首先在第二章，以達卡加工出口區為例，我除了指出地方恩庇侍從關係及分配政治仍是重要運作邏輯，也指出跨國企業管理制度和加工出口區國家特別規範的疊加，促成有別於區外的性別互動場域。本章結尾我指出女性工人的居住難題，反映性別秩序、工廠管理、都市空間政治、國家發展規劃的交織鑲嵌。

接下來在第三章，以女性工人所棲居的都市非法貧民區為分析對象，我指出，在正式行政體系缺失的地方，突顯出權利的參差、隨情境變動、積累性質，而非政府組織計畫的實行，則成為重要的權利實踐場域。活躍於貧民區內的各類組織，藉由合法性與非法性的橋接，維繫區內的基礎生活機能，其中承襲恩庇侍從關係和掌握外來資源的人，能夠取得支配權力。貧民區因而成為混淆既定國家治理機制與公民社會內涵的地方，不同權利狀態在此碰撞、游移。

最後在第四章，我描述隨著成衣及服飾加工產業鏈在孟加拉國內擴張，各類促進工人權益的組織紛紛發展，包含工會與勞工非政府組織。它們針對女性工人的日常需求提供相應協助和資源，經營以女性工人為連帶的新興社會空間，不僅提升女性工人參與勞動協商的意願，還形塑權利概念的文化價值，促進權利的脈絡化，引發認同感受。然而，跨國品牌企業、在地工廠、地方與國際勞工組織之間的多方關係和行動，尤其是在 2013 年 Rana Plaza 事故後，使勞資情境和工人權利意義競爭場域更加複雜。

結論部分我指出，對女性工人來說，維護「作為工人」的權益，與成為「更理想的」女性、公民，時而相互嵌合，彰顯主體能動性的多重演繹。

本文除了必要的地名及公眾人物名，所有人名、工廠名、地名皆為化名。

doi:10.6342/NTU201903708

第二章　都市治理與加工出口業女工

第一節　前言

本章我以圍繞達卡加工出口區所發生的事件及現象，描述在達卡都市治理中，形塑女性工人基本權益狀態的重要因素，也就是都市地景分化、侍從主義政治、性別秩序。

首先，從 2016 年 7 月的達卡攻擊事件後的「緊急管制措施」，我指出政府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突顯出加工出口區及其附屬區域被打造為連結跨國市場和資本主義生產專區，而與在地社會之間形成部分相連又部分隔絕的關係；其中，「恩庇侍從關係」下的政治經濟內涵，亦反映在加工出口區的運作中。

在達卡加工出口區，因匯聚僱用高比例女性員工的成衣加工廠、由國家訂定專門規範、以及外資企業有別於本地企業的管理體制等因素，促成有別於區外的性別互動場域。最後，對照女性工人因遷移而面臨的居住困境，突顯出受到發展主義主導的都市空間競爭與地景分化，所衍生的矛盾在女性工人身上體現，反映出性別秩序、跨國工廠管理、都市空間政治、國家發展規劃的交織鑲嵌。

第二節　都市治理的表現

一、攻擊事件及緊急管制

2016 年 10 月，孟加拉加工出口區管理局（BEPZA）發行的季刊 *BEPZA Bulletin* 上出現以下內容：

> BEPZA 承諾提供加工出口區的外國投資者足夠的安全強化措施，包含區內及他們的居住地……因應 Gulshan 外交領事區 7 月 1 日發生的恐怖襲擊，於 7 月 21 日召開討論安全問題的專門會議，有來自全國 8 個加工出口區共 60 名投資者與會。……BEPZA 已在全國各加工出口區，增加 24 小時監視器的裝設量……也要求各區所在地執法單位**增派維安人員至投資人居住社區。**……各加工出口區入口已增添安全設備如安全門、金屬探測儀、車底檢視鏡，所有員工進出都必須出示身份證件。（BEPZA 2016）（粗體底線為本文所加）

doi:10.6342/NTU201903708

此季刊內容顯示，該年 7 月發生的達卡攻擊事件，引起加工出口區的外國投資者擔憂，以致於，總管加工出口區事務的國家管理局，在事發後迅速採取措施，將位於達卡市近郊（Savar Upazila）距離市中心約 35 公里遠的加工出口區，列為重點提高安全性的對象，並同時強化全國其他 7 個加工出口區的安全維護。這是在該事件發生後，政府的連串因應措施之一。

2016 年 7 月 1 日發生的這起挾持人質攻擊事件，震驚了海內外孟加拉國人。事發地點就位於達卡市中心、外交領事館集聚的 Gulshan 區（Gulshan Thana），造成 22 名人質喪生，其中 17 名是旅居孟加拉的外籍人士；除此之外，有 2 名警員在救援過程中殉職、5 名犯案者在攻堅過程中被擊斃[14]。

引起我注意的是，儘管伊斯蘭國 ISIS 在事發當天宣稱策畫此事件，孟加拉政府先是堅決否認有境外激進組織在國內集結，保證國家情報系統和反恐機制健全無虞；接著宣布整起事件是由國內反政府武裝勢力（homegrown terrorists）所主導，主謀是「新孟加拉聖戰會（Neo-JMB）」成員[15]，在總理隨後發表的談話中，也公開譴責那些「暗中支持武裝勢力的在野政黨」和「散佈過度恐怖新聞的國內部份媒體」（Riaz 2018）。

官方對此攻擊事件的應對和態度，清楚反映區域地緣政治的敏感。現今孟加拉政府的棘手任務，是一邊要在包含印度、巴基斯坦、中國等強勢主導力國家的地緣政治中，謹慎維持立足點；另一邊是要極力阻卻國境內、外極端主義組織的滲透與串聯（Siddiqi 2009：165）。

> 在達卡加工出口區工作的 Asif（約 32 歲，於區內一間臺資企業任職近四年，曾在埃及的中資企業工作，因而能說簡單中文）語帶嘲諷地說：「這次攻擊事件，怎麼看都是印度政府的陰謀，想讓外國人不敢來孟加拉！」。（2016/08/17 田野筆記）

[14] 有關達卡事件的過程，整理自相關報導 BSS 2016；Anam 2016；Barry & Sattar 2016；Hammadi, Scammell & Yuhas 2016；Manik, Anand & Barry 2016。

[15] 孟加拉聖戰會（Jamaat-ul-Mujahideen Bangladesh [JMB]），2005 年被孟加拉政府公布為極端組織並下令取締（Riaz 2018）。

doi:10.6342/NTU201903708

Lusana（約 27 歲，營養師）在談及達卡事件時，顯得餘悸猶存，但像是要盡力安慰我似地保證道：「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這裡[達卡市]從二十多年前開始就有很多外國人來投資、居住，**我們跟巴基斯坦不一樣**，我們對外國人友好、也抵制宗教激進組織。雖然這次攻擊事件看起來是針對外國人，但是你不用擔心！我們的政府已經在控制當中。」（2016/08/05 田野筆記）

從兩位當地友人的表述可見，民間對攻擊事件的理解，在國家認同情感之外，更關注事件是否將降低外來投資者對孟加拉投資環境的信心。這與國家經濟高度倚賴外資集中於少數產業的現況有關（儘管近年來積極透過政策推動產業轉型和多元化）。

這起攻擊事件也使人聯想起 2013 年迄今所發生的多起有明確針對性的傷害事件（參考註 9）。在此之前，主流意見傾向認為這些傷害案是「個別行動」、「孤立事件」，然而達卡攻擊事件把人們的恐懼推向新的高峰，對於執政黨的反激進主義立場、因應策略產生更尖銳地質問，對其始模糊、迴避的態度更加不滿（Anam 2017；Stark 2016）[16]，這當中還混合了對該黨統治力量擴張的憂慮。人們一方面因感受到激進主義勢力座大的威脅，而冀望政府能夠採取更強效作為時，並批評者通常認為執政黨在反激進主義、反暴力的整體態度上太顢頇、舉棋不定或徇私；另一方面，人們也注意到，在主要反對黨聯盟（孟加拉民族主義黨和伊斯蘭大會黨）接連因貪汙弊案及戰爭罪而官司纏身的情況下，對於人民聯盟制衡力正在弱化（Riaz 2016：5）。

達卡事件發生後，政府對境內非法武裝組織展開雷厲風行的掃蕩。從事件發生後到 2018 年 6 月，僅主要媒體如《每日星報》（*The Daily Star*）、《達卡論壇報》（*Dhaka Tribune*），就報導超過 30 次、狙擊 80 名以上武裝人士[17]的行動。然而，通常是只在行動結束後，大眾才會從媒體上得到消息，且對於被圍剿對象的深入調查，不是付之闕如就是甚少被公開[18]。批評者因而擔心，在缺乏制衡和監督下，這

[16] 見報導 Editorial (2016) Our Sorrows Know no Bounds.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July 3.

[17] 見報導 Star Online Report (2018a.) Fight against Militancy to Continue.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July 1.

[18] 見報導 Islam & Khan (2018) All-out Efforts in Tough Times Only.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July 1.

doi:10.6342/NTU201903708

些反激進主義的掃蕩行動將導向來自政府的更嚴密監視和獨裁化治理。面對被政府矢口否認的暴力執法，著名的孟加拉小說家 Tahmima Anam（2017）就在事件發生一年後寫道：

> 謀殺案已經漸漸歇止，極端份子開始隱匿他們的踪跡。然而他們的威脅卻以其他更加隱微的方式在迴響：在政治異議者所經歷的隨機暴力中，**在政策對激進群體的讓步中**，在滲透到一切的無形恐懼中。孟加拉公民正陷入**渴求安全和擁有自由**的兩難之間。（粗體底線為本文所加）

在我的觀察中，Anam 所謂「渴求安全和擁有自由」的兩難，滲透到都市空間秩序上。達卡事件後，市中心區域開始實施各種交通管制，包含：在稍有規模的商場入口，都加設金屬探測門和人工安檢；除了「達卡之輪」（Dhaka Chaka）這間客運公司，其他公車禁止在 Gulshan 區通行，這使民眾行經此區若不坐私家車，便只能搭乘這種收費較高的空調巴士，而不像過去有多種選擇[19]；貧民區 Korail 到市中心的船運被禁止，使得必須每日到市區當工廠工人、建築工、家庭幫傭、車伕才有收入的居民，要繞路和付出更高昂的交通費。除了交通管制，以 Gulshan 區為首，Banani、Baridhara、Niketon 等高級住宅和商業區隨後跟進，在各大路口增設檢查哨，開始限制人力車流量，包括規定車伕必須登記取得執照、穿著標有區名的橘色背心，才能在限定區域內載客，無法再隨意穿行（不過以小費解決這些限制的情形所在多有），乘車者因而可能必須在一段旅程中，換搭不同輛人力車才能抵達目的地[20]。

在我事隔一年後回到達卡，發現有多項空間管制措施已常規化，尤其是針對長久以來被認為是造成市中心交通混亂主因的人力車，這使無數車伕的生計受影響[21]。可以說，達卡事件的發生觸發了一次都市空間整頓，使都市地景階級分化過程

[19] 在田野工作進行當時，達卡市的普通空調巴士（A/C Bus）與無空調巴士的區段價差約 5-10 塔卡。

[20] 見報導 Staff Correspondent (2016) Exclusive bus, rickshaw for Gulshan area.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August 11.

[21] 見報導 Prins (2017) Rickshaw Restrictions: Privilege for Some, Disaster for the Puller.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November 11.

doi:10.6342/NTU201903708

再一次強固，在提升對部分人的安全保護時，排除了另一部份人，增加其生活風險，而在都市近郊工廠工作的女性工人便多數屬於後者。

二、加工出口區設立與侍從主義政治

圖片 11　達卡加工出口區圍牆外景象
（來源：作者攝）

軍政府時期（1975-1990）一改獨立初期短暫實行的集權式社會主義政治路線，以及進口替代和國營工業領頭的經濟策略，推行經濟私有化、自由化，積極引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發展組織的援助資金，同時開放國內市場，強化與世界資本、金融體系的連結（Feldman 1998：42；Schendel 2009：144-151；Siddiqi 2000：12）。

為了吸引外資投入並發展低技術成本的加工出口製造業，齊亞·拉赫曼政府開始規畫設立加工出口區，1983 年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在吉大港開始生產，此後陸續於全國各地區（District）增設了 7 處。近年來，全國 8 處加工出口區年度總出口值，持續佔全國年度總出口值約 20%（BEPZA 2017）。根據孟加拉央行的資料，2019 年全國總出口額中，成衣及服飾類產品佔全國總出口額 85%，顯示成衣加工業現今仍是孟加拉最重要的出口產業（BEPZA 2017；Bangladesh Bank 2020）。

doi:10.6342/NTU201903708

人類學者 Patrick Neveling 曾比較不同地方的加工出口區發展經驗，認為這些加工出口區的共同特點，是以「部分國家主權功能」換取貿易發展，融合了自由貿易區、海關保稅區和工業區的機能，以專門規章管理，集中建設基礎設施，成為匯聚國內、外資本和勞力的所在，也因此，是否能整合行政程序、提供簡便而單一窗口的服務，便是加工出口區能否創造預期經濟效益的關鍵。由於在地方、區域、國家、國際等不同層次都擁有連結關係，使加工出口區往往具有與地方共生、又顯著「非地方」（non-local）的性質（Neveling 2015：166-167；Zohir 2003：64）。

現今全國加工出口區[22]都是由國家加工出口區管理局（Bangladesh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Authority [BEPZA]，以下簡稱管理局）轄管。管理局是直屬於總理辦公室（Prime Minister's Office）的機構，負責維持加工出口區的順暢運作，以吸引外資、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出口品多樣性為目標，從徵用及管理工廠預備用地，建造廠房、水電、倉儲等基礎設施，審核設廠計畫書，核發進出口許可證及員工工作證等業務都一手包辦。在加工出口區入口處，管理局設置了崗哨，所有人員、物料、貨品都要受檢才能進出；通過入口哨，區內各工廠多數有自行另外設置門衛。檢查哨與圍牆的存在，有形地區隔加工出口區與週遭空間。

回溯孟加拉加工出口區的設立背景，1970 年代末，孟加拉國內基礎建設仍然集中於少數都市，且因政權更迭導致財稅制度繁複，在此情況下設置加工出口區被當時的政府認為是極佳的經濟發展選項，欲以國內充沛人力吸引外資，以求在短時間內提升國內產業境況、技術並連結國際市場（Aggarwa et. al 2008：20）。而在國際上，在 1974 年生效的〈多種纖維協定」〉（Multifibre Arrangement）[23]，賦予歐、美等紡織成衣品進口國，能針對集中於東亞的南韓、臺灣、香港等地的紡織成衣品出口國，制定出口配額限制。這樣的協定促使這些企業開始尋覓新生產基地，也就成為孟加拉獨立後第一批進駐發展紡織成衣業的外企（S. Khan 2002：179-180）。

在國際資本主義轉移、重組的推波助瀾下，1980 年通過《孟加拉加工出口區

[22] 分別是 Chittagong EPZ（1983）、Dhaka EPZ（1993）、Mongla EPZ（1999）、Comilla EPZ（2000）、Uttara EPZ（2001）、Ishwardi EPZ（2001）、Adamjee EPZ（1999）、Karnaphuli EPZ（2006）。

[23] 〈多種纖維協定〉（Multifibre Arrangement [MFA]）賦予簽屬國在國內紡織、成衣產業因進口產品的競爭而受損時，可以採取進口配額限制。這項協定在 2005 年終止，使全球織品貿易與 WTO 為首的自由貿易體制合流，不再有特定國家的管制措施。

doi:10.6342/NTU201903708

圖片　12 孟加拉加工出口區管理局招商廣告（來源：BEPZA 2017）

組織條例》（Bangladesh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Authority Act），加工出口區陸續開始運行，同時推動一連串促進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及工業發展的制度改革[24]，並接

[24] 所通過的工業發展相關法案，如 Industrial Relations Rules（1977）、Bangladesh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Authority Act（1980）、Foreign Private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ct（1980）、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1980、1987）、Industrial Relations Ordinance and Amendments（1980、1982、1984、1985）、The Finance Act（1981）、New Industrial Policy（1982）、The Employment of Labor Ordinance（1985）、Revised Industrial Policy（1986）、Industrial Relations Act（1990）等（Ahmed et al. 2014；Rock 2001）。

doi:10.6342/NTU201903708

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資金及指定的結構調整方案（structural adjustment），持續推動「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計畫。

三十餘年來，這樣的國家發展思維和經濟政策取向，成為孟加拉歷任政府之間少有的共識（Schendel 2009；Ahmed, Greenleaf and Sacks 2014；Siddiqi 2017），現今仍明示於國家管理局官方網站及加工出口區的招商廣告上（圖 12）。

> 為了透過工業化來促進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政府採取了旨在吸引外國投資的**「開放政策」（'Outdoor Policy'）**。……設立加工出口區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投資者一個環境適宜、**免於複雜手續**的特殊區域。（BEPZA 2017）（粗體底線為本文所加）

不過，在大力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市場改革時，多位政治、經濟學者指出侍從主義政治的並行（Ahmed et al. 2014；Kabeer 1991；M. Khan 2000）。從軍政府時代開啟軍人出任政府要員的先例，持續以人事命令、融資許可、執照發放等方式，攏絡有高民眾支持度的政治要角和企業家，鞏固其統治基礎，形成「侍從主義式獨裁」（clientalistic authoritarian）。到 1990 年民主化改革，侍從主義分配政治並未衰退，甚至更進一步結合政黨派系爭鬥（Ahmed et al. 2014）。

> 在 70、80 年代，有大量公共資源被以金融形式，從國有銀行流向特定新興企業，幾乎就是那些現今規模最龐大的製造業集團。這些資金來源於國際，由國有銀行向雙邊或多邊貿易合作國取得。（Khan 2000：27）

究竟侍從主義政治如何運作？在既有孟加拉研究文獻中，如政治學者 Meghna Guhathakurta，曾以「佔領沙洲」（*char dokhol*）來比擬（Guhathakurta 2002，引自 Siddiqi 2010：43-45）。這源自一種孟加拉鄉民社會中土地資源取得及分配的方式。由於全境大部分土地位處三角洲，地勢低平、河道縱橫，在河床中會自然形成大小不一的沙洲（*char*），沙洲的形成與消失無法被準確預測，於是在孟加拉語中有許多詞彙形容「短暫出現的土地」，*char* 便是其中之一。新形成的沙洲容易成為地主（*jomidar*）競爭的目標，佔領的意義並不僅著眼於土地的實質使用價值，而更在於佔領行動本身的權威展示，能強化象徵權力，吸引鄉民跟隨（ibid.）。

doi:10.6342/NTU201903708

Roslin（孟加拉語言中心教師）說：「你知道，雖然現在已經是實施民主政治，但一到選舉就特別明顯……重要的是候選人所『代表』跟保障的東西……就像 *char dokhol*，只是目標不是 *char*。在我看來，所有無主地現在應該都要先歸國有，而不應該再被隨便佔領**……**但我知道有些鄉下地方，*char dokhol* 對地主和農戶來說還是大事，我還聽說過，戰爭剛結束那時候，有一些 *char dokhol* 曾變成很嚴重的衝突……。」（2017/09/30 田野筆記）

經濟學者 Mushtaq Khan（2000：17）描述，在孟加拉社會所盛行的佔有資源後再分配、從而鞏固力量的恩庇侍從關係，是「一種跨階級的結盟」，能發展超親屬、宗教、地方認同關係，且以明確的物質交換為基礎，如土地、執照、福利津貼，到公部門和國營企業職缺、銀行融資等，都能作為標的，也因此會盡可能確保經濟活絡。然而，Khan 也認為，因取決於可實際分配的資源內容和組織動員能力，所以這類結盟關係實際上並不穩固，容易被鬆動、取代（ibid.：16-26；29-31）。

其他對侍從主義政治的看法，如 Simeen Mahmud 和 Nalia Kabeer 認為：

孟加拉的侍從主義政治和現代國家體制，共同佔領公部門體系及資源，助長一類統治菁英階級的形成。他們為鞏固政治權力和個人利益，給予為其認可能發揮政治影響力的人特權，包含企業家、工會領袖，以換取在國家與地方不同層面的支持。（Mahmud & Kabeer 2003：24）

侍從主義政治所衍生的政黨派系分化，不只影響政府機構，也延伸到民間，包括地方議會（Upazila Council）[25]、幫派組織（*mastans*）、學校、商會、工會等，侵蝕行政效能，並形成索賄風氣和裙帶關係人事（Guhathakurta 2002：3；Rahman & Langford 2012：95-96；Rock 2001）。即使是在被設計來服務資本主義生產和跨國市場的加工出口區，由恩庇侍從關係所形成的分配政治，仍然是重要運作邏輯，表現如下：

[25] *Upazila* 是孟加拉行政區劃名稱，相當於臺灣的縣轄鄉鎮市或直轄市轄區。

doi:10.6342/NTU201903708

興榮工廠的財務主任 Sabrina 說：「管理局三不五時就會派員來『視察』，但大家都知道他們只是來要錢。像我們公司到這裡設廠不久，很多營運需要的執照、文件都還沒拿到手，管理局明明知道這不是我們的問題，卻還是會說我們違規，這時候就要用別的方式打發他們。」Sabrina 苦笑：「我必須要編列一筆 speed money，專門用來打通關，不然所有事情都會被延宕。這是臺灣的主管常常無法理解的。」（2016/08/03 田野筆記）

28 歲的 Fahim，在加工出口區裡從事關務工作約兩年，聊起他做這份工作的原因，他略帶抱怨道：「大學畢業後我原本想考海關，但在這裡工作兩年，我現在越來越肯定，在我們國家啊，沒有關係背景，根本就不用想當上公務員。」（2016/08/15 田野筆記）

儘管國家管理局試圖在加工出口區建立起「單一窗口服務」，讓投資者可以免於累贅手續而完成原物料進口、產品出口等通關過程，並減少在這些過程中的「檯面下」交涉，但正如前述加工出口區員工的經驗顯示，加工出口區的實際運作卻並未如預期般能夠自「外於」地方社會。面對管理局官員直接登門，或在與其他政府部門、事務所往來中被索賄，加工出口區裡的外資廠商也發展出應對策略，關係良好的廠主會互通情報，共同討還 speed money 的額度；相對而言，剛進駐的新廠往往在不知門道的情況下，付出在金錢、待遇、或辦事效率上的代價，進而影響產能。

興榮廠的採購組長 Romi 說：「我們公司當初也是有考慮在區外設廠啊！但後來還是決定先租下區內現成的廠房。在區內還是有些好處的，可以減免設備和原料的進出口關稅。雖然得應付管理局的人，但至少還是比外面有規則的。」（2016/07/18 田野筆記）

國家管理局的行政職能，在於藉由加工出口區建立能吸引投資者的生產環境，自 2010 年修改《加工出口區工人協會和工業關係條例》（The EPZ Workers Associ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Act）後，也成為名義上的「勞資紛爭第三方調

doi:10.6342/NTU201903708

解者」[26]。在我的觀察中，管理局官僚上層對於加工出口區內企業，傾向於維持一種放任、但隨時可以跟進的距離，且當中還有其他行動者參與資源競爭，例如以下紀錄：

> 晚餐後碰到興榮場的人資主管 Lee，他指著堆積在廠房外空地月餘的成堆廢棄物，抱怨道：「這些東西只能堆在這裡，不能馬上處理，因為都要交給區裡專門收廢料的公司，不能隨意叫人來收，不然會很麻煩……這些回收公司就像是黑道要保護費一樣，管理局也睜隻眼閉之眼啦。」（2016/07/31 田野筆記）

若按官方規定，所有進出加工出口區的物品，無論是廢棄物、原料或生產設備，都要申請許可文件和遵守一系列關稅法規才能出入；Lee 的談話則顯示，這成為一項能夠「分派」的資源。

本段我嘗試描述達卡加工出口區運行和侍從主義政治的相交面向。加工出口區受世界資本主義移轉影響，由國家經濟策略主導，持續朝出口導向深化發展，此過程與地方秩序和治理的發展，則呈現出相互牽引的關係。無論是 Subrina 所說的 speed money，還是 Lee 所抱怨的「不能馬上處理」，這些時間指涉都意謂著「等待」，而「等待的時間，取決於事情本身的不確定性和複雜度，經常代表有複數以上的規則體系在運作」（Das & Randeria 2015），在達卡加工出口區，「等待」則是緣於侍從主義政治下的多層分配，而是治理性的表現。

三、加工出口區的性別意象

> Anika 現在大約 26 歲，是她所工作的工廠中第一、也是目前唯一的女性產線領班。有 HSC 學歷[27]的她，會說簡單的英文，還把駐廠中國籍工程

[26] 此法案最早是 2004 年在美國勞工暨產業工會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FL-CIO]）的介入下訂定，讓加工出口區工人可以合法組織勞工協會（Worker's Association），然而這項權利又在 2008 年修改的《加工出口區組織條例》（EPZ Authority Act）中被取消，直到 2010 年才重啟，更名為勞工福利會（Worker's Welfare Societies）（Eusuf, Faruque & Rahman 2007：7）。

[27] Higher Secondary Certificate [HSC]，相當於臺灣的高中學歷。孟加拉官方認可的教育體系，普

doi:10.6342/NTU201903708

師常使用的一些中文字詞背下來學著使用。她的丈夫也在加工出口區中的另一間工廠工作。夫妻倆是結婚後才一起來到達卡市生活。

我：在這裡工作跟在其他地方工作有甚麼不一樣嗎？

Anika：我喜歡在這裡工作，我學得很快，沒有太大困難。（想了想又補充）這裡很乾淨……很有秩序（discipline），而且我不會因為跟男同事講話就被其他人一直盯著。（2016/08/20 田野筆記）

Anika 所指的「秩序」，在達卡加工出口區的脈絡中，首先可以理解為來自對工廠環境的身體經驗。Anika 所工作的工廠，專於玻璃鏡片的製造、組裝，是達卡加工出口區中少數不與紡織、成衣產業鏈相關的工廠。由於鏡片生產製程要求高度清潔，使得廠房內部不像一般成衣廠悶熱、擁擠、塵絮飛揚，並規定：作業員進入廠房內要更換室內鞋；進入特殊工作間還要穿戴防塵衣帽。在主要工作間的牆面、桌面上，都可見到提醒工人「保持乾淨」、「物歸原位」的標語。這些規定本身，連同由此形成的環境差異，構成 Anika 對「秩序」的感受。

圖片 13 工廠內工作間標語（來源：作者攝）

通系統中的基礎教育文憑是 PSC（五年）與 JSC（三年），中級教育是 SSC（二年）與 HSC（二年），高級教育是 college diploma（二年）與 university degree（學士三年或四年）。另有英語、伊斯蘭宗教學校（*Madrasa*）、軍校三種獨立教育體系。

doi:10.6342/NTU201903708

除了對環境的感官經驗，在 Anika 的表述中，「秩序」的另一層面是關乎工廠內的性別互動。據社會經濟學者 Nalia Kabeer（1991，1997）的研究，在孟加拉一般家庭中，對於女性在工廠工作的顧慮，常見有如：家務勞動人手不足、有損男性「養家之人」的顏面及地位、需要和非親屬關係男性經常往來。Anika 特別指出「這裡很有秩序，而且不會因為跟男同事講話就被其他人一直盯著看」，顯示她正重新認識工廠勞動中的性別界線及性別關係。究竟性別實踐場域如何在加工出口區內再結構，甚至鬆動某些社會性別秩序？

首先，從統計資料上可見，加工出口區內女性工人人數，長期略高於男性[28]。其次，在 Dina M. Siddiqi 針對達卡市內工廠性騷擾所做的調查中，提到了加工出口區內「本地男性陽剛氣質受壓抑」的現象，女工們向 Siddiqi 形容「區裡的男人像綿羊」（Men in the EPZ are like sheep.）、「他們很安靜，因為他們怕失去工作」（They've been silenced, the ones who remained are terrified of losing their jobs.），她認為這樣的現象與區內工廠管理方式和針對性規範相關（Siddiqi 2003：37）。

首先是，加工出口區內工廠以外資為主，與本地工廠慣用的家長式管理方式相較，外資工廠更加強對工人身體的直接控制，舉凡作業時間、製程、服儀、行動都有詳細規範，且能更直接解聘不合作員工。相比之下在區外本地資本工廠，工人在工廠勞動中經歷的文化斷裂經驗並不強烈，工人和廠主共同依賴既有社會關係、也受其制約。總體而言，工人在區外本地工廠擁有較高的身體自主性和行動自由，但加工出口區內高強度的身體控制，反而形成對女性工人人身安全的另類保障（Siddiqi 2009：168-170）。

其次，因工廠規模而影響管理方式，加工出口區內工廠規模較大、財務狀況較穩定，所以能減少生產線突發的趕工情況；相較之下，區外眾多本地工廠，以小型外包工廠或家庭代工廠為主要形式，多數時候只能被動接受訂單和交貨期限，造成趕工焦慮，進而增加工廠主對工人施與肢體及言語暴力的機率。最後，針對性規範的訂定，是因加工出口區較易受國際性勞工組織和世界主要市場消費者關注，促使國家管理局訂定特別規範，如保證區內員工年薪調幅 10%、提供夜班女性員工公

[28] 2017 年國家管理局報告顯示，全國 8 個加工出口區所雇用的勞工，有 64%為女性（BEPZA 2017）。根據孟加拉織品製造與出口工業協會的統計，2015 年紡織、成衣加工業僱用人數達 440 萬人，其中 80%為女性（BGMEA 2015）

doi:10.6342/NTU201903708

共交通工具等，無形中促使區內工廠對於生產過程中，可能對工人身心狀況構成騷擾的情境，有較明確的概念和預防措施（ibid.）。

Siddiqi 的研究說明了加工出口區內、外性別場域的差異，如何進一步構成 Anika 所感受到的「秩序」。在 Anika 工作的工廠，管理幹部曾向我轉述另一個故事：一位新進的男性作業員主動反映希望能增加隔離措施，以避免和女作業員在同一準備間穿戴外罩式防塵衣帽。然而此建議最終沒有被接受，因管理階層（包含本地人及外國人）不認為有必要加強不同性別工人使用空間上的區隔，而認為「他應該要練習適應」。將新作業員與 Anika 的經歷併置，顯示在達卡加工出口區中，熟悉的性別輪廓被模糊、界線被鬆動。加工出口區內由於工廠管理模式、專屬規範，結構了新的性別場域，處在這個場域的所有行動身體都需要有所回應。

四、女性工人的都市居住情境

前段我描述了加工出口區內新性別場域的結構，然而位於區內的工廠仍是整體成衣及服飾加工業的少數，更多工廠座落在區外，女性工人需要跟隨工廠分布，穿行於都市空間中討生活。無論是規劃加工出口區的國家管理局，或入駐加工出口區的工廠，一開始都並沒有特別重視工人的居住問題，工人多數是自行在加工出口區周圍租屋居住（Zohir 2003：65-66）[29]。在成衣加工業持續成長的背景下，女性成為薪資工人的比例持續提高，而「單身女性如何居住」也成為議題焦點。

整理近年與女性工人居住情景相關的報導可見，單身女性工人遇到房東拒絕出租的比例相當高[30]，這使她們只好向更不安全、條件更不足、以租金更高的地方尋屋，或是乾脆選擇隱瞞未婚、離婚、丈夫出走等單身情境[31]（Salway, Rahman & Jesmin 2003：882）。一位朋友以自身經驗向我解釋當地女性工人居住選擇的困境：

> Nitisha（正在就讀 Jahangirnargar 大學研究所）：「我也曾想要在學校附近租屋，因為從我家到學校路上的交通太混亂了[經常塞車或淹水]，而且

[29] 有研究指出，加工出口區員工的住宿需求，在鄰近地方帶動房地產交易活絡（Hossain 2014）。

[30] 在達卡加工出口區工作的 Asif 指出，2016 年 7 月 2 日的達卡事件發生後，單身男性的租屋困難度也提高了（2016/08/16 田野筆記）。

[31] 見報導 Jahan (2017) In Search of Home.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March 31; Parveen (2008) Woes of Single, Working Women Looking for a Lone Living.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December 14.

doi:10.6342/NTU201903708

學校附近到達卡市中心比較方便，我在市中心的一間攝影工作室有兼差……但是要找到適合的出租房真的很困難，而且我父母非常、非常反對……問題就在於，**人們並不關心女性離家獨居的真正原因，他們總是把女人跟家庭連在一起，總是先設想一個正常家庭的女性不會獨自居住，除非她做了甚麼不好的事。**」（2016/8/17 田野筆記）（粗體底線為本文所加）

不只是女性工人，對於有遷移需求的廣泛職業女性、女學生而言，「租屋」都成為阻礙，有些屋主還會在女性尋屋者之間再作區分，「比較歡迎女學生，因為職業婦女經常會晚歸，不好管理」[32]。從成衣及服飾加工業在 1980 年代後期開始大幅成長算起，經過二十餘年，「單身女性居住權益」才公共化，引起主流社會討論。

孟加拉婦女會（Bangladesh Mahila Parishad，即 Women's Council of Bangladesh）[33]秘書長 Ayesha Khanom：「單身女性中有七成在成衣加工廠工作。她們為國家帶來大筆收入，她們的居住需求應該受到更多關注。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屋主的觀念需要改變，女性的現實處境應該要被社會正視，並給予更多尊重。」（Parveen 2008）

儘管民間組織極力呼籲政府應該介入，與企業、房地產開發業、銀行共同研擬公共住宅方案和居住補助，對女性來說安全、健康、友善的住所仍然稀缺，這牽涉至少兩個層面。

首先，即使承租給職業女性、女學生的住宅數量漸增，以「安全」為名制定的各種門禁措施相當普遍，租屋者須承受程度不一、來自警衛和鄰居的監視目光，而當這套保護觀念和缺乏法規規範的私有租屋市場結合，便進而形成對女性的壓迫

[32] 見報導 Hossain (2014) Women's hostels spring up around the city. *Prothem Alo*. Discover September 28.

[33] 孟加拉婦女會的成立背景是在獨立初期，由一些政治罪犯的女性親屬組成（多數屬於人民聯盟 Awami League），在 1980 年代發展為孟加拉聲勢最大的女性組織之一，是推動孟加拉女性運動的先驅，會員數一度超過 3 萬人，以都市中產階級婦女為主，立場偏保守（Jahan 2018：105-106；Feldman 1998：40-41）。

doi:10.6342/NTU201903708

結構，例如利用女性缺少選擇的弱勢處境，收取高額房租[34]。雖然自政府興建女性工人社會住宅後[35]，開闢了一些免被私有租屋市場綁架的選項，但對於預算有限又無人脈關係的多數單身女性工人來說，這個選項顯得可望而不可及。

第二個層面是，在居住選項不多、社會住宅租金相對便宜的情形下，出現社會住宅乏人問津的現象，顯示女性工人對居住空間的期待，和政府的評估存在相當落差。

以我進行田野調查時的加工出口區附近房租為例，在 Anika 上班的工廠裡擔任清潔工的 Saba 告訴我，要承租附近由鐵皮、竹、粗磚搭建的簡單棚屋，她須付的月租金是 3000 塔卡，而她當時的月薪是 8800 塔卡（2016/07/15 田野筆記）。以此對照《每日星報》2018 年的報導，指出一棟位於達卡加工出口區附近、由國家婦女事務局（Department of Women's Affairs）[36]負責管理的女性社會住宅，儘管租金只要 1000 塔卡，在 2017 年初開放承租後直到 2018 年中，744 個租位只有 90 個順利出租。該篇報導對於住宅硬體設施的描述，指格局有如營房，一個空間切分出 60 多張床位出租，且在開放承租時全棟只有 12 套衛浴設備，也未完成瓦斯管線鋪設，承租對象則只限有工作的單身女性或單身母親與七歲以下孩童一名[37]。該報導也採訪了女性工人，她們認為「沒有隱私」和「不方便」是缺乏承租意願的主因。

無獨有偶，當我在 2017 年拜訪一個名為「婦女倡議中心」（Nari Uddug Kendra，即 Centre for Women's Initiatives）的非政府組織時，創辦人 Mashuda K. Shefali 女士告訴我，組織名下的計畫，除了女學生宿舍，所有女工宿舍計畫都已終止。根據她提供的資料，該組織最早於 90 年代起就關注女性工人的居住問題，也從 1993 年開始陸續與公、私部門合作，在達卡市不同地區興建了三棟女工宿舍（提供 600 個出租空間）及二棟女學生宿舍（提供 150 個出租空間）（2017/08/12 田野筆記）。

---

[34] 見報導 Hossain (2014) Women's hostels spring up around the city. *Prothem Alo*. Discover September 28.

[35] 在達卡市，目前由政府籌資興建的女性社會住宅共有四處，提供 1637 個出租空間，見報導 Akash & Mirdha (2017) 2017 Female Garment Workers' Dormitory has no Takers.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November 3; Khaled (2017) Safe Accommodation for Single Working Women Needed. *The Independent*. Discover September 28.

[36] 為隸屬於婦女和兒童事務部（Ministry of Women and Children Affairs）之下的政府機構。

[37] 見報導 Mirdha (2018) Two more Dormitories for Female Garment Workers.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July 30.

doi:10.6342/NTU201903708

Mashuda：我們現在投入比較多力氣在鄉村社區醫療和企業監察工作。女工宿舍計畫已經慢慢停止了。

我：為什麼不繼續女工宿舍計畫呢？

Mashuda：一個原因是政府補助和企業贊助經費都減少，所以很難維持……另個決定性原因，是我後來發現，女工她們不喜歡集體宿舍，她們寧願選擇條件比較差、租金比較貴的地方，但可以接待丈夫、孩子、家鄉來的親友，她們覺得宿舍空間太不方便。（2017/08/17 田野筆記）

相較於為了興建全國第一個女工宿舍四處奔走時所受到的質疑，例如認為女工集體入住會為周圍社區帶來「混亂」，或預定地地主家族女性擔心危及自身名譽而拒絕讓 Mashuda 的團隊承租土地（Siddiqi 1996），後續浮現的「女工不願意住宿舍」情形，不在 Mashuda 的預期內。如同前述《每日星報》報導的社會住宅案例，Mashuda 所想像、勾畫的女工宿舍藍圖，並不期待女性工人有家庭需求，而是抽離社會關係網絡、形單影隻且同質的工人個體。對照前述女性住宅倡議者的論述，其實隱含著「女性因『有貢獻於國家、社會或家庭』而『值得』更好住所」的思維，而在社會住宅空間體現了「隔離」和「便於工作」的設計。這是考量「工人」需求多於考量「女性」需求，欲透過空間將女性「裁剪」成適合資本主義發展計畫的模樣。

單身女性在達卡都市環境居住的困難，來自都市空間的激烈競爭和性別秩序的壓力，這些也是國家與資本發展計畫所衍生的衝擊。社會學者 Petra Dannecker（2000）也曾觀察孟加拉的女性工人居住議題，對 90 年代孟加拉社會來說，離開有男性監護人的原生家庭或親戚住家與工廠同性別同事居住，是鮮少聽聞的新舉，所以 Dannecker 認為，當女性工人開始接受這種新居住形式時，表示她們正逐漸接受「工人」身分（ibid.：38）。在我的觀察中，女性工人對於社會住宅表現出牴觸態度，但個別工人的能動性更展現於，她在國家與資本計畫的安排外，透過熟悉的社會關係網絡，在陌生的都市環境中搭建生活、抵抗成為工人可能帶來的汙名。對社會住宅的態度和對居住空間的安排，傳達了對「女性」與「工人」兩種身份的理解，以及個人在特定生命歷程的選擇。

doi:10.6342/NTU201903708

第三節　小結

本章我描述在達卡都市治理中，形塑女性工人基本權益狀態的重要因素。以因應達卡攻擊事件的緊急管制措施為例，在「加強社會安全保障」的過程中，催促都市空間整頓和地景階層分化。加工出口區在都市地景中，由國家親自設計出超地方性質，以快速吸引世界資本、勞力和市場；不過在此同時，恩庇侍從關係也是確保加工出口區運作的重要邏輯，是一種治理性表現。

加工出口區的特殊地景，又因匯聚了僱用高比例女性員工的成衣加工廠、跨國工廠管理體系，加上國家制定的專門規範，從而形成有別於區外的性別場域。性別秩序變化下，工人需要調整特定的性別表達，性別界線也產生游移。對照女性工人的居住難題，可見性別秩序結合資本與國家發展計畫，企圖將徘徊在都市邊緣的女性工人重新編制，也成為女性工人對自身狀態的理解和生涯安排的內容。都市地景分化、侍從主義政治、性別秩序等不同治理力量的交織、競合，以及所形成的排擠和衝突，在女性工人身上體現。

在接下來的第三、四章，我將呈現女性工人如何在不同治理力量交錯的間隙中，拼湊權利話語。

doi:10.6342/NTU201903708

第三章　都市貧民區與公民權利

第一節　前言

1980 年代後期，成衣及服飾加工品開始穩定成為孟加拉年度出口額最高的產品（Zaman 2001：148）。隨著工廠林立在都會周圍地帶，創造了大量成為薪資工人的機會條件，吸引人們向都市遷移。此時，都市貧民區（*bosti*）數量顯著增加，成為眾多加工廠工人居住的地方。

本章第一部份，我描述女性工人棲居在都市貧民區的具體生活情況。在以不同管道確保經濟和生活安全的過程中，*bosti* 的女性居民擴大了自身的行動能力、掌握更多種物質資源的管道，也分擔更多家戶所面臨的危機。而大量非政府組織在貧民區的介入，推動以女性為合作對象的各式發展計劃，不僅成為她們的重要收入來源，更藉此建立新知識範疇，影響權利實踐的經驗。

第二部份，我描述都市貧民區因應國家正式行政系統的缺位而衍生出地方組織，一面維持貧民區的基礎機能，一面藉由合法與非法的橋接，維繫恩庇侍從關係，形成對內部的支配秩序。貧民區為一個混淆既定治理機制與公民社會內涵的地方，突顯出權利本身參差、隨情境變動、積累的性質。

第二節　非法貧民區的女性

關於孟加拉女性成為成衣及服飾加工業主要勞動力的歷史過程中，工廠工作與女性收入的意義變遷，我以社會學者 Fauzia E. Ahmed（2004）的研究為主要參考文本。

Ahmed 追溯，在 1970 年代後期至 1980 年代初，當時加工出口區尚未設立，而達卡、吉大港、庫爾納（Khulna）等都市也尚未有大量女性工人集聚，首批進入成衣廠工作的女性，其身份背景較為單一，多來自鄉村的低階中產家庭（lower-middleclass household）。這指的是，他們在鄉村擁有磚房和土地，卻缺乏支應日常開銷的現金（ibid.：37-41）[38]。來自這樣家庭的女性，平時往往受到比更底層婦女

[38] 參考第一章第二節第一段「在地女性賦權計畫的省思」，在 70 年代後期，因飢荒和鄉村經濟結構轉變，促使女性跟家庭剝離、向都市遷移。

doi:10.6342/NTU201903708

還要多的行動約束，而進入工廠工作，特別是由親戚開設或在其中任職的工廠，便成為一個「可以接受」的選項，因為那裡被認為能延續「家庭保護力」，無損於家族和個人體面，所得的現金收入除了能解決生計問題，還能以添置傢俱擺飾的方式，彰顯家族地位。於此同時，工廠主人也樂意說服親族到工廠工作，除了可以節省成本，還能因提供親友工作機會而博得好名聲（Ahmed 2004：37 ；Kibria 1995：301-303）。

其後，飢荒和農業機械化持續促使鄉村婦女流向都市（Hossain 2018：5-8；Zaman 2001：149）。到了 90 年代，成衣加工品出口貿易擴張，加工出口區紛紛設立，勞動力需求大增，但工廠間的競爭壓力加劇，使得工廠工人的身份與背景開始複雜化，整體工作環境和條件卻惡化。工廠對女性工人而言，不再是「安全又無損於體面」的場所，以突顯女性與家庭連結的社會價值觀來貶抑女性工人之類言論的出現，加重女性工人的壓力（Ahmed 2004：39；Karim 2014：57）。社會學者 Nazli Kibria（1995：303-304）的記錄，就描繪出當時一般人對於工廠工作的印象：

> Simmi 是位 22 歲女性，有兩個小孩，儘管丈夫的收入足夠維持家庭支出，她仍然認為[在成衣加工廠]工作取得額外現金收入有必要，主要原因是她覺得這是一個**「好母親」應該做的**，她將這筆收入的主要部分留作讓小孩能夠就讀私立學校的儲蓄，認為那樣的教育能確保他們未來可以維持中產階級生活。她的丈夫一開始反對她在工廠工作，因為覺得**工廠裡都是粗魯又低階的人（uncouth lower-class persons），不適合女性。**（Kibria 1995：301）（粗體底線為本文所加）

當社會多數人認為工廠不再屬於家庭保護力覆蓋範圍、聚集了複雜社會背景人群的地方，無形中便增加女性進入工廠工作所需面臨的壓力。除了對「工廠工作」印象的更迭，女性的現金收入在從前也往往不被當作家戶主要經濟收入，而更常是被用作「維持身份」、或僅是「輔助性收入」。不過，在 Korial 這樣的都市貧民區，為了因應高風險生活環境，女性常從事多樣而拼接的經濟活動、擔負主要家庭生計，也對現金收入有不同看法。以 Maya 為例：

> Maya 現在 32 歲，她和丈夫 Sohail、二個女兒、一個兒子一起居住在

doi:10.6342/NTU201903708

Korail，迄今為止已住了將近二十年。在剛搬來達卡、到小孩出生前的那段時間，Maya 曾在成衣加工廠工作約三年。離開工廠後，她便不曾再做過正式的薪資工作，而是透過在家做裁縫、參與非政府組織和政府的發展計畫、組織 *shamity* 等方式，來維持現金收入。（2017/9/20 田野筆記）

Shamity 是一種流行於孟加拉民間的儲蓄互助會，微貸流行後微貸機構也常輔助籌組，此外，受雇於同一間工廠的員工也常參與同一個 *shamity*（Devine 2003：234-240；Zaman 2001：152）。在 Korail，參加 *shamity* 的成員以女性為主。

現今 Maya 和 Sohail 在 Korail 的家，是由三個相連的單間和獨立廁所組成，總共約 10 坪大小。Maya 將最外側、與公共通道接鄰的一間，整理成小服飾鋪，家戶活動在正中那間，最後一間則當作出租間（月租介於 1500-2500 塔卡），目前是她的妹妹在使用。Maya 的妹妹來達卡念 college，已在 Korail 生活將近一年。Maya 說，她其實很滿意現在的工作模式，因為時間分配較自由，且比在成衣廠工作輕鬆，「工廠工作真的很辛苦」。

doi:10.6342/NTU201903708

Maya 與 Sohail 的大女兒，幼時在 BRAC[39]於 Korail 興辦的學校就讀[40]，現今在公立的 college 念書，同時也繼續參與 BRAC 在 Korail 的辦學計畫，教導社區裡的孩童。

當聊到如何分配家裡收入時，Maya 笑著說：「在家裡我說的算！」，這句話引起所有圍坐的女伴們一陣哄笑，連負責翻譯的 Roslin 也跟著笑。而現場唯一的男性、Maya 的丈夫 Sohail 則只是靦腆地笑笑、並未答腔，繼續坐在旁邊聽我們談話。（2017/9/20 田野筆記）

根據一項在達卡市 Mohammadpur 區（Mohammadpurt Thana）針對 25 個 *bosti* 的 5 歲以上、共 1129 位男性和 1245 位女性進行調查的量化研究，呈現出 *bosti* 女性活躍地參與現金收入活動，日常移動範圍較大、對於家戶事務和取得物質資源的管道也有較大程度的掌握和決定權。她們往往從事多樣活動來及時取得現金收入，這些活動常見有收房租、種植作物、飼養家禽、充當街頭運動群眾和參與社區發展計劃等，這些現金收入是因應日常危機時刻的重要資源（Salway, Rahman & Jesmin 2003：881-882；900）。

[39] BRAC，自 1972 年創立的孟加拉非政府組織，創辦人為 Sir Fazle Hasan Abed（他個人在 2009 年受英國女王策封為爵士，組織則於 2015 年獲頒「世界糧食獎」）。組織最初名為「孟加拉重建協助委員會」（Bangladesh Relief Assistance Committee），是為了協助在獨立戰爭之後的難民重返家園。成立次年開始將工作重心從緊急救援轉到長期社區發展，改名為「孟加拉鄉村發展委員會」（Bangladesh Rural Advancement Committee），致力於有效而永續地對抗飢餓與貧窮，曾試驗推行的計畫如婦女微型貸款、家禽養殖農牧計劃等。

現今 BRAC 組織下擁有孟加拉最負盛名的私立大學 BRAC University、最大的乳製品公司 Aarong Dairy、商業銀行 BRAC Bank、使用人數最多的行動支付平臺 bKash。這些營利單位成為 BRAC 的內部經濟資源，使其能在推動發展計劃上不受資金侷限。BRAC 的發展模式和試驗計畫已在孟加拉之外的國家推展，包括烏干達、坦尚尼亞、獅子山共和國、南蘇丹、賴比瑞亞、海地、阿富汗、巴基斯坦、斯里蘭卡以及菲律賓。參考 BRAC 官方網站 http://www.brac.net/。孟加拉人類學者 Karim（2011）對 BRAC 及其計畫的反思，見第一章。

[40] 在 Korail 以辦學而活躍的非政府組織，除了 BRAC，還有 JAAGO Foundation。JAAGO Foundation 是成立於 2007 年在地公益組織，致力改善孟加拉的教育環境和消除文盲，以免費提供貧困兒童教育和青年培力為主要工作，參考網站 https://jaago.com.bd/。

doi:10.6342/NTU201903708

[*bosti* 中]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經常能帶來新的社會連結和機會，特別是在危急時刻的資訊取得、臨時支出、借貸，這些連結途徑經常成為轉移家戶經濟風險的關鍵。（ibid.：897）

該項調查還分析，在所有適合女性的現金收入工作中，較穩定者又屬成衣廠作業員[41]、家務工、低技術手工勞動、自營小販等四類。工廠作業員和家務工平均薪資較高，但都嚴重限制女性的時間分配自主性：前者單日工時長、有休假日但經常要求加班；後者單日工時較短、卻幾乎沒有休息日。工廠工作常被稱為 *chakri*（occupation）而非 *kaj*（work），意味著是一份較正式、非臨時性的工作（ibid.：893-5）。

在這四種工作中，自營小販的平均年齡最高，工廠工人平均年齡較低，家務工和其他手工勞動則沒有顯著年齡取向，受訪者表示這是因為小販需要穿梭的公共空間以男性為主，故比較適合年長女性（idib.：895）。再對照研究中對 *bosti* 男性工作的調查，顯示男性以人力車伕或其他交通工具司機、服務業（廚師、旅館服務生、理髮師）及技術性手工（金屬工匠、木匠、砌牆工匠）為主。作者們特別指出，即使不一定擁有生產工具（例如需要承租人力車），仍有超過半數男性是屬於自僱者；相對而言，女性的工作多定點、定時，按日、週、月給薪的型態，顯示出明顯性別差異。

生活於都市 *bosti* 的女性，高程度地參與現金收入活動，同時擴大空間移動能力、掌握更多種物質資源的管道，也分擔更多家戶所面臨的危機，因應環境條件而做出應對，以下以 Maya 和另一位居住在 Korail 的女性生命經驗為例說明。

Maya 透過向 BRAC 的微型貸款來開設服飾店，也擔任微型貸款的中間代理，替 Korail 其他婦女做貸款擔保，同時也負責敦促還款；她不僅是婦女自組 *shamity* 的財務管理人，在政府實行的都市貧民區發展計畫中（UPPR），也被選為 Korail 的負責人之一，「她們覺得可以信任我。」Maya 說。（2017/09/20 田野筆記）

[41] 成衣廠工作薪資，隨職位不同可再細分，由高至低一般分為產線領班（在 *bosti* 中少見）、作業員、助手（helper）。

doi:10.6342/NTU201903708

Rehana 是另一位常代表對外發言的 Korial 居民，她在非政府組織「都市貧民區居住發展組織」(*Nogor Doridro Bostibashi Unnyon Sangstha* [NDBUS])擔任秘書。

> Rehana 說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家務幫傭，之後在一間服飾店和雜貨店打工，然後進入成衣廠工作約九年。在 2007 年她離開工廠，之後參與了許多非政府組織計畫，包含加入 JAAGO 當老師（參考註 40）、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挹注的一項女性培力計畫當培訓員、參與 DSK[42]的環境衛生推廣項目等。搬來 Korail 居住已將二十年，Rehana 說目前還沒有結婚的打算，想要繼續做現在這些「有意義的工作」。
>
> Roslin 在回程路上說，她很驚訝 Rehana 還沒有結婚，「這很勇敢，」她說「她的家人非常特別。」(2017/09/30 田野筆記)

Maya 和 Rehana 兩人年齡相仿，Rehana 目前未婚，與母親、哥哥同住，但有獨立經濟收入；Maya 則自言對家戶內事務有主導力。在她們的日常生活中，社會上對婚姻常抱持的「丈夫為養家之人」(bread-winner)觀念並沒有明顯意義，她們各自的收入也沒有被歸類為「輔助性收入」。在家戶之外的地方工作、出入不同空間，對 Maya 和 Rehana 及她們的家人而言，也不是特別需要避免的事情。最後，在兩人的生命軌跡中，除了都曾在工廠工作，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們都在離開工廠後，從事過多樣非政府組織活動，以此維持現金收入，同時建立個人聲望和關係網絡。

貧民區的女性為了因應生活，持續擴充自身行動能力，而非政府組織在地方的介入，以女性為各種發展計劃合作對象，不僅成為她們的重要收入來源，更建立新知識範疇，進而影響更長久的生涯計劃，「比起低薪、期待低、彈性小的工廠工作，社區中的非政府組織工作似乎有更多機會和可能性」(Hossain, Jahan & Sobhan 1988：132)。下一節我將針對貧民區內部支配性秩序的形成，來理解 Rehana 和 Maya 所處的社會、經濟位置，以及由此主張權利時，可能要實際承擔的代價。

---

[42] Dushthya Shashthya Kendra，即「醫療保健中心」(Medical Health Center)，成立於 1988 年，以推廣環境衛生教育為目標，參考網站 http://www.dskbangladesh.org/。

doi:10.6342/NTU201903708

第三節　都市非法聚落的秩序與危機

一、非法貧民區的自力更生

我：*Apu*，住在 *bosti* 有甚麼優缺點嗎？

Maya：太擠了，而且水、電、瓦斯都不夠（Maya 家的水管只在每天上午供應一小時，其他時候必須倚賴井水），也怕人家要來收走土地和房子。醫生和藥也不夠。不過這裡的氛圍很好，**大家像 village 一樣**。

我：你想搬出去嗎？

Maya：**想啊！再怎麼說，這裡都是暫時的。**政府現在有蓋一些房子讓我們的人搬去住，我去看過，我覺得還可以。這裡沒有 college……如果搬過去，Shamuli（她的小女兒）就可以去那邊的 college 念書了。但是如果真的要離開這裡，我還是很捨不得。

我：那你的小女兒和小兒子，你最希望他們以後做甚麼工作？

Maya：女生當然是當醫生最好，男生當律師、電腦工程師都很好。

當天離開 Korail 後，Roslin 跟我說：「Korail 給我的感覺真的跟 village 很像。」（2017/9/20 田野筆記）

Korail 的居民來自孟加拉全國各地，使用不同方言，因此在這裡不容易見到一般孟加拉社區常見的綿密親屬網絡。儘管如此，Korail 居民卻發展出讓 Maya 及外來者 Roslin 覺得「像鄉村」的社會連帶。

分析此社會連帶的性質何以像「鄉村」，首先是在於日常生活、社交和經濟活動高度疊合。Korail 居民在物質和空間條件有限下，共享廚房、淋浴間、廁所等設施，在狹小的空間中形成高度社會關聯。以造訪 Maya 的經歷為例，從 Bou Bazar 穿越曲折逼仄的小徑到達 Sohail 和 Maya 的家，總會發現已有另外二、三位女性在屋內，她們通常會留下來，旁觀我們的訪談甚至加入對話。我們的訪談經常被來訪的鄰居、頭頂竹籃挨家挨戶叫賣的小販給打斷，Maya 會在門口叫住小販，邊和他講價閒聊邊回答我們的問題。

從空間共享到緊密社會連結，鑲嵌在時刻面臨驅逐風險的貧民區生活中。社會學者 Matthew Desmond 對美國都市租屋和驅逐情境的研究就指出，同樣面臨驅逐

doi:10.6342/NTU201903708

風險的人們，因為某種「共感」，可能願意給予鄰人一些脆弱的支持，締結一種隨時「可被拋棄的連結」（disposable ties）。他還指出，「驅逐」產生的社會效果是「累積性」的，將影響個人身心狀態、經濟活動、社會關係；長期面對驅逐壓力者，情緒及精神狀態容易起伏，進而導致社會關係上的阻絕。物質條件的不穩定或不良，加上制度設計結果，使「被驅逐」經常成為一項有負面意義的標籤。因此，驅逐處境固然是貧窮導致的結果，卻也是造成貧窮的眾多源頭之一（2016）。

在本研究的觀察中，Korail 居民最常談論的危機，圍繞著「缺乏親屬連帶」和「沒有保障的土地/房屋租期」。缺乏親屬連帶主要是因頻繁遷移所導致；租期無保障，則突顯了地權混亂與非法佔用的現實。為了處理危機，Korail 居民發展出許多在地組織，根據 Shahadat Hossain 的研究，其中有專責處事務、影響較大者為以下三類：基礎設施組織、市集管理委員會（Bazar committee）、清真寺管理委員會。本研究目前主要關注基礎設施組織。

基礎設施組織的運作，是從 Korail 周圍的合法住宅區拉設水、電、瓦斯管線，分配給區裡居民，並從中收取費用。這類組織的產生源自對於土地的非法佔用，連帶導致無法合法地取得公共設施的供應。以水管管線的情況來說，2007 年在 Korail 的兩個市集管理委員會代表協調下，達卡市政府水資源管理局（Dhaka Water Supply and Sewerage Authority [DWASA]，以下簡稱水管局）曾允諾敷設合法水管管線到 Korail，但僅限於市集廣場附近。現今，多數 Korail 居民仍然要透過各種不同管道才能取得民生用水，在水源緊缺時，所付出費用可能高達水資源管理局公定水費的 10 倍以上（S. Hossain 2013：219）。

在 Korail 從事水資源買賣者，靠著賄絡負責視察非法管線的警察和水管局官員，來確保私接水管不被截斷。而自從區內開始有合法水管後，就屢屢傳出有水管局官員在發放水管權狀時收賄的新聞（Hasan & Mollah 2017；S. Hossain 2013：218-221）。此種利用合法、非法性的中間橋接來牟利的手段，並不限於在地組織或政府官僚，而其他電力、瓦斯線路也以類似方式運作（Hasan & Mollah 2017）。

除了基礎設施組織，在地專門組織還包含兩個市集管理委員會、十一個清真寺管理委員會（Mridha et al. 2009：14）。一則關於市集管理委員會形成的故事被紀錄如下：

[Korail]地方領袖的組成，在這十年間經歷過重組。*Mastaan*（幫派）對

doi:10.6342/NTU201903708

在地市集的支配力在 2003 年被挑戰。在過去，只有向 *mastaan* 繳交管理費的人才可以在市集和附近街巷做生意，*mastaan* 也控制水、電、瓦斯管線……2003 年，一些店主聯合警察、政黨附隨組織成員、區代表（Ward Councilor），組成市集管理委員會，*mastaan* 的壟斷才從此減弱，而一些區外人士則開始在 Korail 區內兩個最大集市裡開設店鋪。（S. Hossain 2013：213）

此段紀錄顯示，市集管理委員會的形成，雖然代表 Korail 區內兩大市集和廣場不再被幫派勢力把持，卻代之以多方力量分據、角力的權力支配結構，如區外人士直接出任三類在地專門組織的幹部。

市集管理委員會、基礎設施組織、清真寺管理委員會三類專門組織，共同主導 Korail 內部公共空間的使用安排、接洽各類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發展計畫、分配居住空間、組織消防隊和治安巡邏隊。當爭端出現時，會成立 *salish*[43]來仲裁；當有共同利益或面臨風險時，也會串連行動。儘管有 T&T 公司、政府公共工程局等名義上的地主，但實際掌握區內土地分配、利用和交易者，則是能得到執政黨地方辦公室支持的在地組織領袖（S. Hossain 2013：216-217）。然而前述三類組織，嚴格來說其實是掌握在個別成員手上，如 Maya 的丈夫 Sohail 以及前段所提的 Rehana 這樣的成員，他們多數保持著與政黨及非政府組織的多重關係。

Sohail 在 1983 年就來到 Korail。他自述，曾經當過人力車夫、私人轎車司機和成衣廠工人，後來參與 BRAC 的計畫，逐漸成為 Korail 裡的意見發言者。現在他除了在北達卡市政府第十九選區（Ward No.19）**區代表辦公室擔任秘書**，也在 2010 年組織了一個**以 Korail 為範疇的發展基金會**（目前有 32 位會員），其中有兩位主要贊助人來自**執政黨 Awami League 的地方附隨組織。**Sohail 還負責打點社區診所[44]。

[43] *Salish* 是孟加拉民間常見的一種糾紛調解會議，由地方政治領袖、宗教教長和有名望人士組成。

[44] 社區診所（community clinic）是現執政的 Awami League 政府，於 2008 年開始推行的計劃。是在鄉村地區，由官民合資、地方政府提供土地來設立診所，定期提供基礎藥品和聘請醫護人員進駐或巡診，迄今在全國，共有約 13 萬個駐點，然而每個駐點的運作情形良莠不齊，以致有人呼籲

doi:10.6342/NTU201903708

我：Sohail *bhai*，現在 Korail 還是持續有人遷入，你都怎麼協助他們？

Sohail：我會幫他們找地方住，通常是先免費的，然後幫他們接洽適合的地主。（Sohail 對於 Korail 五大分區家戶數都相當清楚）。比如說，在三月那場火災[45]，我的基金會就想辦法募資，最後募到 500 個臨時帳棚來安置受災戶。（2017/9/21 田野筆記）

在地專門組織外，另有二十多個非政府組織活躍於 Korail，提供微型貸款、基礎教育、醫療照顧、鑿井、修路等，構成 Korail 的日常情景。Rehana 所參與的 DSK（參考註 42），即從 2004 年開始，提供貸款給 Korail 居民中擁有固定住所者，建造廁所和修繕房屋附近通道（ibid.：214）。該組織及其在 Korail 中的成員，也曾經成功說服水管局到區內架設全區水管，但卻遭到在地水事業商阻撓，使得水管管線雖然於 2010 年鋪設完工，卻未啟用（ibid.：221）。

Korail 在地組織經常藉由援引外部資源，如警察、特定政府部門、政黨附隨組織和地方辦公室等，依循恩庇侍從邏輯，組織性地占有資源並取得支配性地位（Hackenbroch & S. Hossain 2012）。不過，從市集管理委員會取代 *mastaan* 的壟斷地位，以及非政府組織 DSK 與區內水事業組織的衝突，顯示權力支配機制既相互牽制也相互依賴。下一段落，將從 Korail 的驅逐危機，描述貧民區居民的都市想像。

二、非法貧民區的危機

現今在 Korail，既有漂泊的租客，更有許多「小」地主，在多重的承租關係下取得土地。如此不被官方承認、也不易為外人道的「非正式」產權關係，構成了 Korail 居民日常擔心被驅逐的主要原因。

A Jonathan S. Anjaria（2016）對孟買街頭小販的研究指出，對於驅逐小販相關行動的反對或支持，反映出都市空間競爭關係者對於「非正式性」的不同理解，而

改革運作模式，由地方政府和在地非政府組織接手（M. A. Ahmed 2018；Karmakar 2015）。

[45] 發生於 2017 年 3 月 16 日，相關報導見於《每日星報》，同則報導中還描述另一場發生於 2016 年 12 月 4 日的大火（*The Daily Star* 2017）。

doi:10.6342/NTU201903708

這又來自於對都市空間的想像，其光譜兩端，分別是認為都市是「理性靜態的規畫結果」，以及認為都市是「時刻改變的動態組成」。例如，對部分孟買都市中產階級民眾而言，因想像都市是「理性靜態的規畫結果」，而無法有效管理街頭小販，便意味著以政府為首的管理機構與中間利益相關者勾結，是權力腐敗的表現，因此支持驅逐行動等於是對既得利益者的制裁以及法治規則的彰顯。

在達卡，大規模的貧民區整頓行動通常是由政府部門主導，以「公共利益」和「都市建設」為名[46]而不顧強制拆遷命令導致的貧窮處境惡化。支持行動的官員、執行單位和部份都市居民，有些主張「政府對都市窮人的協助，會助長更多人擁向都市，導致環境惡化」（S. Hossain 2013：210），有些則是對貧民區的自主運作方式抱持質疑，期望以一套更讓各方滿意、理解的措施來取而代之，例如以下這篇投書：

> 我非常欣賞貴報在昨日刊登的一篇由 Rashidul Hasan 和 Shaheen Mollah 所撰寫的報導[47]。……。很明顯，有龐大的利益團體在參與**侵蝕國家資源和剝削那些不幸的居民**。我特別擔憂向那些[貧民區]居民**供應瓦斯的安全風險。**在釀成任何悲劇之前，政府應該立即調查這項潛在危險，並採取**安置**這些弱勢民眾的必要措施。**貧民區火災意外不斷**，過去已經有很多人強烈要求政府替這些居民尋找安全的替代住所……政府怎麼能夠放任他們繼續在那裡呢？我真誠地希望那篇發人深省的報導，能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並幫助扭轉那些不可避免的悲劇。（Shaheen Hussain，《每日星報》，2017 年 7 月 12 日）（粗體底線為本文所加）

Korail 的近幾次火災事故，是由在地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緊急調動重建物資來減緩災損，區代表鮮少主動介入 *bosti* 內部事務（Ahasan 2017；Correspondent 2017；Dey 2017；Mollah & Saad 2016；Saad 2017）。在 Korail 區內常駐的非政府組織，雖然能提供經濟支持和其他服務，但多數也並不直接介入驅逐事件，其中一個原因是所有非政府組織，必須在總理辦公室下的「非政府組織事務局」（NGO Affairs Bureau）

[46] 例如在 2017 年政府表示有意要在 Korail 所在地規劃一個「資訊與通信科技園區」（ICT Park），見報導 Ahasan (2017) Korail Slum Dwellers: Perenially Punished.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July 21.

[47] 見報導 Hasan & Mollah (2017) Korail Slum: Goons Eating up Public Resources.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July 10.

doi:10.6342/NTU201903708

登記審核後才能開始運作，因而有所顧忌（S. Hossain 2013：217-218）。

因此，當 *bosti* 發生緊急危機時，真正重要的行動者是 Sohail、Rehana、Maya 這樣的居民。例如，Sohail 動員他所成立的基金會發起物資募集；Rehana 則在火災後，以 NDBUS（都市貧民區居住發展組織）秘書長身份，參加由「孟加拉法律援助和服務信託」（Bangladesh Legal Aid and Services Trust [BLAST]）[48]於隔日召開的會議[49]。這些少數居民憑藉對區內在地組織的影響力，以及在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之間保持靈活連結，善用不同身份，不僅掌握社區日常運作的發言權，也能對外尋求資源，化減都市對貧民區的排除壓力。

我：*Apu*，三月份的火災是怎麼回事呢？

Rehana：去年到現在已經發生三次大火了。（Sohail 在一旁補充道：其實這裡火災很常發生。）三月那次是在凌晨……可能的起火原因有很多，比如電線走火、菸蒂……沒有人知道真正原因。但我覺得，這**是有人想要把我們趕走才做的，是一個警告。**

我：為什麼會這樣覺得？

Rehana：以前他們就曾經用不同方法想驅逐我們，後來法院給我們可以繼續居住的許可文件，**他們沒辦法了，才用這種方式威脅我們**……[在這裡居住]最危險的事情就是火災了，只要一發生就擴散很快，因為**房子的材料**，還有這裡**路很小，水車進不來**。三月那次火災真的很嚴重，起火地方附近很多二層樓的房子和店鋪，而且起火的時候很多人都還在睡覺，是聽到禮拜堂的警報才醒來的[停下來跟坐在一旁的 Sohail、幾位居民討論火災]。

我：所以，有甚麼辦法阻止火災嗎？

Rehana：**我們在訓練社區的志願消防員**，以後我們還會有滅火設備，一個 NGO 願意提供給我們。還要辦更多訓練，教大家火災知識。（一邊跟

[48] 成立於 1993 年，成立宗旨是為邊緣及弱勢群體提供全面的司法途徑，是現在孟加拉國內唯一無償提供包含刑事、家事、民事、土地、憲法法律諮詢與協助的機構，也參與重大公共議題的訴訟，目前在全國共有 20 個辦事處，參考網站 https://www.blast.org.bd/index。

[49] 會議名稱為「Making an inclusive city: securing the right to shelter and livelihood」，相關報導見於《每日星報》、《達卡論壇報》（Mahmud 2017； Staff Correspondent, *The Daily Star* 2017）。

doi:10.6342/NTU201903708

Sohail 確認參與救災訓練的人選，一邊對我說）……這其實**應該是政府該做的事，我是說在確保大家安全方面。**……老實說，現在政府對 *bosti* 已經比以前的 BNP 政府友善了。

我：那麼，你覺得 *bosti* 跟 *nogor*（city）的關係是甚麼？

Rehana：*bosti* 跟 *nogor* 的 middle class 應該是一起生存的。外面的人對 *bosti* 出身的人常有不好的看法，**但我們不應該責怪一個人的出身或他從哪裡來的**，不是嗎？。（2017/09/23 田野筆記）（粗體底線為本文所加）

對於貧民區與都市的關係，Sohail 則主張貧民區就地合法化，並指出這麼做對兩者有益的地方：

我：Sohail *bhai*，你覺得 *bosti* 跟 *nogor* 是甚麼關係？

Sohail：雖然政府有一些住宅計畫讓我們搬去住[50]，但比起遷去其他地方，我更希望 Korail **就地合法化**，因為這裡**有很多工作機會**[離都市中心區近]。Korail 已經存在很久了，在這裡出生的小孩現在都已經上大學，而且這裡的人 90%都有受教育，像今年就有 9000 多人拿到 PSC……你不可能讓 *bosti* 消失，***只要有 nogor，就會有 bosti***。所以最好就是可以共存，比如說，有人曾經跟我說，最好是有人推動**把 *bosti* 分散到達卡的每個 ward**，這樣就不會有一些 ward 很有錢、有些 ward 很窮，而且每個人都可以找到工作。我們應該**要聯合所有 *bosti* 來跟政府提出類似的方案**。（2017/09/21 田野筆記）（粗體底線為本文所加）

居住環境條件低，火災風險高，又需要面對驅逐威脅，Korail 居民在經歷一次次危機中形成了對貧民區和都市關係的看法，反映出多數 *bosti* 居民，被真正隔絕的並非經濟資源，而是參與都市治理的權力（power），以及與這項權力相關的基礎設施近用權（rights）。這也突顯出這些權力，大多由少數能與區外政治單位、社區在地組織、非政府組織三方關係良好的 *bosti* 特定居民收攏。他們是當都市與 *bosti*

[50] Sohail 所提到的公辦住房計畫，如同第二章所提的那些讓多數有迫切需求的女性覺得「可望不可及」的公辦女性宿舍，實際上普通 *bosti* 居民往往無法企及，只有與相關政府部門關係良好者，才有分配機會（Mahmud 2017）。

doi:10.6342/NTU201903708

衝突時，能發揮斡旋力量的人，同時也是代表 *bosti* 向其他都市治理單位協商的人。非政府組織若要確保計畫順利推行，也需要和這些居民「領袖」維持良好互動，且避免和在地專門組織的利益衝突。不過，以 Sohail 為例，這樣的居民通常會有不只一處居所，這點足以減輕他們對於被驅逐的焦慮。

本段我指出，由於國家治理性多數時候回應不及時，而由其他掌握物質資源和政治連結管道的個人或組織，形成貧民區內部的支配機制。在 Hackenbroch & S. Hossain（2012）對 Karail 的研究中，已探討了由少數人所積累形成的權力結構，透過與 *bosti* 之外社會（執法人員、政府單位、NGO 組織）建立關係連帶而成就。經由對都市非法聚落之秩序與危機的描述，我進一步指出，貧民區中個人對危機的因應能力，影響其對於生活安全的感受，譬如 Sohail 和 Maya 夫婦，不安定感使 Maya 希望遷出 *bosti*；然而，Sohail 在參與應對 *bosti* 的日常或突發危機過程中，積累了物質資源和名望，取得近似完整公民的狀態，沒有強烈的搬出意願。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我描述，達卡的貧民區是眾多來到達卡、進入工廠工作的女性所生活的地方，居住在貧民區的婦女，活躍地參與多樣經濟活動，擴大自身的空間移動範圍、掌握更多家戶事務決定權和物質資源的取得管道。從 Rehana 和 Maya 兩位的經歷可見，貧民區女性持續發展自身行動能力，其中參與非政府組織計畫，成為女性能夠運用於改變自身處境的重要渠道。

貧民區的存在，超出都市發展的既定藍圖。支撐貧民區日常運作的機制，因應國家治理性的延遲，但仍然依賴著國家治理權威和侍從主義分配政治，而在區內獲得支配力。部分居民在此權力機制中取得主導地位，比起其他居民，他們有能力與都市中的排除力量進行交涉。在對基礎設施的侵佔、拆除、再搭建的循環過程中，都市貧民區成為「長存的」非法地帶（Das 2011：327），在既定治理機制與公民社會內涵中製造灰色地帶，進而突顯公民權利本身的參差、隨情境變動、累積性質。

doi:10.6342/NTU201903708

第四章　權利的認識與不滿

第一節　前言

隨著孟加拉的成衣及服飾加工業發展，女性工人對權利的解讀，受到工會、在地組織、政府部門、國際組織的互動影響。本章內容，我區分「權利概念的生成」與「工人運動軌跡」兩個討論層次。

在「權利概念的生成」方面，人類學者容紹武（2005：100）曾描述：「人民對於權利的認知，並非只是根據自由、普遍主義者的公民權想法所得而來——該想法允許公民擁有正式及固定的權利與義務——而比較是從具體的脈絡而來。」以 Awaj 基金會為例，我指出這樣的勞工非政府組織，由於在運作上比正式工會更有彈性，因此除了能活絡工人之間的連結，更成為形式混雜的權利知識傳輸及實踐場域，促成日常需求與權利主張的連結，進而形成權利概念的文化價值。

在「工人運動軌跡」方面，我爬梳成衣業工人組織演變和實際介入權利協商的經驗。隨著成衣加工業擴張帶動女性加入工會和勞工非政府組織決策核心的比例增加，一方面帶動對女性工人日常生活需求的正視，敦促工會與工人建立較平等、互信機制，但另一方面，在爭取權利的過程中，身份與階級差異持續分化、確立。隨著成衣及服飾產業鏈的跨國轉移，以及跨國勞工運動的多層聯繫，不僅發展出多層次的工人團結形式，也形成更複雜的勞資關係與國家／跨國家情境。在地組織頻繁地與國際組織互動下，對地方工廠的勞動監督加強，但也創造權利意義的新競爭場域。

第二節　權利概念的生成脈絡

> Shirin 向我介紹 Awaj 提供給工人的課程，從淺到深，分別是營養、理財、領導力。我好奇「營養」課程的內容，Shirin 說：「就是讓工人們學著怎麼在有限預算裡，讓自己和家人都更健康，比如告訴她們甚麼食物有營養、每天要喝足夠又乾淨的水、讓小孩睡飽、培養衛生習慣避免傳染病等等。」（2017/09/15 田野筆記）

Awaj 基金會的成立宗旨，是推動孟加拉工人權益的提升，特別是關於女性工

doi:10.6342/NTU201903708

人和海外客工[51]。從 2010 年加入基金會工作，Shirin 現在已是核心職員和資深講師，參與安排工人培訓課程，也常隨基金會執行長兼創辦人 Nazma 出席各種關於勞工權益的會議。

從 Shirin 的描述與 Nazma 的自述，我瞭解到現年四十多歲的 Nazma 早在 11 歲時便進入成衣廠工作，20 多年的工廠工作生涯中，她不只一次因為帶頭爭取工人權益而被開除，因而在不同工廠間輾轉。累積多年工廠工作和參與工會及相關組織的經歷（包括 BIGUF，是第一個全國性成衣業工會聯合會）[52]，她在 2003 年創立 Awaj 基金會並擔任執行長；又在 2008 年成立「成衣業聯合勞聯」（Sommilito Garments Sramik Federation [SGSF]），擔任主席，目前該組織已有超過 10 萬名會員。

紀錄片《工人之聲》也曾採訪 Nazma，她在片中說到：「所謂的經濟自立（economic self-efficiency），在我看來，是要有足夠的營養、食物、居住、教育、照顧、休閒……這些全部事情。」（Halder 2017）在擔任 Awaj 基金會執行長時，她致力於落實這樣的想法，基金會的主要活動包含為工人提供法律諮詢、醫療資源和勞權知識訓練，開設課程涵蓋飲食健康、理財、勞動法規、談判技巧、組織領導能力等多樣主題。

在瞭解我的來意後，Nazma 安排 Shirin 協助我和前來參加基金會活動的工人談話。在 Awaj 來往的工人以女性成衣業工人居多，有少數男性和其他產業工人。在 Shirin 的翻譯協助下，7 位成衣工人接受我的訪問，分享她們各自在工廠工作的經驗、家庭情況、認識 Awaj 的契機、如何參與 Awaj。我試圖從談話中瞭解工人與工廠、基金會的互動和關係。

一、離開工廠

Masuda 今年 40 歲，她的上一個有固定薪資的工作，是五年前在一間成

[51] 參考第一章第三節第二段〈研究方法〉中的 Awaj 基金會簡介。

[52] BIGUF 全名為「孟加拉獨立成衣業勞工工會聯合會」（Bangladesh Independent Garment Workers Union Federation），創立於 1994 年，學者認為受到「美國勞工暨產業工會聯盟」（AFL-CIO）的區域分支「亞美自由勞工研究中心」（Asia-American Free Labor Institute，AAFLI）的協助。為避免法律定位的權限限制，一開始是爭取以「全國總工會」之名登記，但屢遭勞動局駁回，後來以「工會全國聯合會」的形式運作（Rock 2001）。

doi:10.6342/NTU201903708

衣廠當清潔工和作業員助手。她在那間工廠工作了七年，卻因為跌傷腿而被解雇。認識 Masuda 時，她說她眼睛不好，還有慢性頭痛（儘管不清楚具體病因，但她很肯定兩種症狀都是在工廠上班時開始出現）。Masuda 認為，視力退化是讓她一直沒被提升為作業員的主因，沒能當上作業員，曾讓她幾度想乾脆主動離開工廠。

現在 Masuda 跟丈夫、小女兒、父母同住在娘家親戚的房子，除了要每天負責打理親戚家的家務，每月還需再付 4000 塔卡作為房租。她另有二位已婚的女兒，一位在一間裁縫店當助手，一位沒有固定工作但丈夫是一間工廠的廚工，有穩定的收入。Masuda 的丈夫，原本是一名油漆工，因為一場工地意外摔斷肋骨，之後就無法再繼續工作。那場意外發生後，他沒有從雇主那裏獲得任何補償，醫藥費是在女兒們的幫助下才得以付清。（2017/09/15 田野筆記）

孟加拉女性成為「工人」的生涯，常因各種原因中斷，除了常見的婚姻因素，在 Awaj 工人們和我分享的經驗中，離職主要原因還可以歸納出以下四類。第一類是因傷、病而被解雇，如同 Masuda 和下文的 Razia，她們的身體在工廠中持續耗損，到最後無法繼續工作。

35 歲的 Razia，一年前開始接觸 Awaj，當時是為了治療眼睛。她告訴我她的眼病已經持續四年多了，是在當成衣廠作業員的時候開始出現症狀。4 個月前，她因為沒有達到公司要求的產能而被解雇，不得不離開已經工作六年多的工廠。她說，沒辦法達到產能完全是受視力退化的影響。Razia 有三個兒子和二個女兒，目前家裡經濟收入主要來源是大兒子在當 *Imam*（清真寺禮拜導師），小女兒做家庭裁縫。Razia 已結婚的大女兒現在也在成衣廠工作。另外兩個年齡較小的兒子仍是學生，一位就讀 *Madrasa*（伊斯蘭學校），一位就讀普通小學。（2017/09/18 田野筆記）

在 Awaj 往來的工人，不少與 Masuda 和 Razia 一樣疾病纏身。既有研究指出

doi:10.6342/NTU201903708

孟加拉女性工人身體常見病症有：因長時間在光線不良的廠房內工作導致的眼疾、因廠房內的布料粉塵導致的呼吸道疾病、因長時間在無妥善防護下接觸化學染料所造成的器官病變；除此之外，還有工傷意外造成的傷害，以及因居住在工廠附近高汙染環境所導致的慢性病（Karim 2014：55-57）；最後則是，因高工時、低薪資造成的低落生活條件，導致經常處於營養不良狀態。一位在 Awaj 已有二年駐診經歷的醫師告訴我，她診治的對象中，許多人最初是為了每週的義診和免費藥物而來到 Awaj（2017/09/15 田野筆記）。

> Momadaj 現在 45 歲，曾經在三間工廠工作過，第一次離職是因為家附近淹水而不得不搬家，第二次則是國家水資源局（WASA）以要埋設公共水線的名義，拆除她家所在的整個 *bosti*。最後一次離職，是三個月前工廠無預警關閉。Momadaj 至今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新工作。（2017/09/18 田野筆記）

> Ayesha 在我與 Nazma 討論孟加拉成衣業工人的現況時，主動說：「我開始來 Awaj，是因為八年前，我跟 46 個同事一起，要求廠長付清欠我們的薪水。後來我們就被直接開除了。一直到有同事找來 Nazma 跟廠長談判，我們才拿回一部分的薪水。」（2017/09/14 田野筆記）

離職原因的第二類，是全球成衣產業鏈外包機制和寬鬆的地方法規，加上從孟加拉鄉村釋出的大量人口，使工廠可以輕易地關閉、遷址而免責，以致當地工人若沒有能力「逐廠而居」，就很容易失去工作。第三類原因是關於驅逐，由於許多工人的住所屬於非法佔地，在無法伸張居住權的情況下，長期處於被驅逐的風險中，一旦被驅逐，便不容易繼續保有原來的工作。最後一類，是有如 Awaj 創辦人 Nazma 和 Ayesha，因組織工會或其他爭權行動而被解雇。

這四類原因突顯出女性工人高離職率的結構成因。如前章所述，從事成衣加工業的女性人數眾多且持續遞增，但她們卻經常被阻絕於勞動法規保障，勞動條件低落、居住環境不穩定、容易被騷擾或暴力威脅。不過，從接下來要描述女性工人「走入工會或勞工非政府組織」，可見她們主動干預日常生活世界，進而質疑和介入權力結構。

doi:10.6342/NTU201903708

二、走入工會與勞工非政府組織

Awaj 創辦人 Nazma 分享道：「要讓工人信任你，就要讓他們看到具體的成果。比如說，一開始就實際去幫他們解決在工作上遇到的困難，這樣他們就會慢慢願意接受你說的，然後願意來上課，然後願意去組織起來，解決更多他們自己在工廠遇到的問題。」（2017/09/14 田野筆記）

在 Awaj 的辦公室，我觀察到，要在緊湊排班中抽出時間與精力來參加基金會的活動，對工人而言並不容易，特別是對下工之後還要負擔主要家務的女性工人。有些人會直接在上工時，將小孩暫時安置在基金會辦公室，由基金會職員或陸續造訪的其他工人協助照看。這種對於工人相關組織或工會的信任表現，在過去並不常見。根據社會學者 Petra Dannecker 的研究，由於成衣及服飾加工業的興起，90 年代中期孟加拉的工會組成和性質經歷大轉變，由女性參與核心決策的自主工會興起，相當不同於此前清一色由男性主導、慣以家長心態對待女性工人、附隨政黨之工會（Dannecker 2000；Rock 2001）。

女性工人不願意參加工會，並不是像一些男性工會幹部所說的，因為她們習慣被動、比較無知或無感於自己的被剝削情境。真正原因是，正規工會由男性為主導的階層體系、與政黨勢力的勾結，讓女性工人卻步。（Dannecker 2000：38）

Dannecker 對創始階段的「孟加拉獨立成衣業勞工工會聯合會」（BIGUF）進行研究，發現 BIGUF 於 1994 年創立時，就訂定 15 名執行委員中必須有至少 9 名女性，且所有委員都必須曾經在成衣廠工作至少 5 年。除了以改善勞動條件為目標，BIGUF 也提供多樣滿足工人日常需求的設施，如法律和醫療諮詢、識字班、英語班等，培養工人對勞動契約文件和工時表的基本識讀能力（Awaj 創辦人 Nazma 就是在參與 BIGUF 時學了英文）。此外，BIGUF 的另一項創舉，是鼓勵工會幹部主動接觸工人，例如家庭訪視。這項措施很大程度地改善工人對工會的印象和參與意願，尤其是在許多工人實際上缺乏參與工會行程的時間、金錢餘裕情況下。

由此可見，無論是在工會或勞工非政府組織，組織權力結構和行事風格的變革，

doi:10.6342/NTU201903708

活絡化成員與成員、成員與組織間的關係，且催生以女性為連帶的新社會空間，在此社會空間中進行形式混雜、多元的權利知識傳輸與交換活動。

> 談到為什麼會來到 Awaj，Masuda 說，一開始是聽鄰居提到這個組織，於是起了想來看看的念頭。她覺得在這裡學的東西讓她「改變很多」，我問是哪方面的改變，她自豪地說：「像是**知道甚麼才是健康的食物！**以前我覺得只有肉才有營養，現在我知道蔬菜也有。」Masuda 每個月平均來 Awaj 總辦公室 2 到 3 次，主要是配合有義診的時間，每次都是獨自前來，單趟路程要花將近兩小時。她也常參加 Awaj 在她家附近據點舉辦的 Women café 活動，以及一些免費課程。
>
> Barbin 說：「**這裡讓我感到自在，可以學到很多新的東西，還可以跟人分享生活和工作的煩惱。**」當我問起在 Awaj 的上課情形，Barbin 說特別喜歡在這裡學到的理財和營養知識，「可以回去說給親戚和鄰居聽啊！」她說。（2017/09/15 田野筆記）（粗體底線為本文所加）

上述與 Awaj 會員的訪談，反映出她們對於健康情況的關心。Siddiqi（2000：L15）曾觀察到，女性工人們認為工廠會消耗身體精力，因此最好能多食用適合婦女生產後吃的食物，例如酸豆，以補充營養。在 Awaj 開設的課程中，有關營養、理財的內容最受女性工人們青睞，除此之外，她們也樂於學習育兒相關知識，這些知識符應她們對於「母職」責任的預期。不過，當我向 Shirin 提起工人對於課程規劃的反饋時，參與規劃的她認為，即使不受青睞，為了能實際改善勞資關係，Awaj 仍然應該投入更多心力在工人領導能力、談判技巧的培訓課程上，她同時補充到，Awaj 曾直接針對工廠中階管理人開課，「就是希望他們減少用言語和肢體暴力的方式管理。」（2017/09/18 田野筆記）

從 Awaj 女性工人的談話可見，相較於基金會以介入、改善勞資關係為目標而希望工人學習與工廠管理人談判的技巧和法律知識，工人們來到 Awaj，更常是為了獲取物資和實用知識，除此之外，資訊交換、社交來往等也是吸引她們參與 Awaj 活動的重要原因。我認為，在實質改善勞資關係或形成政治影響力之前，女性工人在 Awaj 先嘗試的是安置自身。Awaj 所營造的外於工廠與家戶且足夠被信任的空

doi:10.6342/NTU201903708

間，有助於女性工人建立支持網絡、積累知識。Ashis Nandy（2012[1976]：36[40-42]）在探討印度文化中「女人」與「女人性」的對峙時，曾形容：

> 真正的挑戰莫過於重新定義她自身。她們面對的首要任務是設法建立機制以減輕他人對她們社會與家庭上某些角色的強調，而能自己去加重強調其他更多角色；如此，她們既能擴張她們的名份，又不全然從其文化底定義中脫出，同時不至於和她們自己心智上的特殊質地產生背離。

我認為這一段描述，能夠捕捉到我所認識的 Awaj 女性工人心境。無論是增進對家庭的照顧能力，還是增加在性別秩序、工廠勞動中、都市生活中的行動力，在 Awaj 這樣在運作上比正式工會更彈性的勞工非政府組織，所能提供的形式混雜、一定程度開放、有特定意向的知識傳輸及實踐場域，女性工人從締結社會連帶為起點，開啟對日常生活世界做出干預、重新定義自身的契機。

第三節　工人運動軌跡

一、協商權利

Awaj 的執行長 Nazma 於《每日星報》一篇名為〈取回工人的力量〉的投書裡，呈現對工人階級女性權利的認知和設想：

> 在工廠工作的經驗，讓我們知道爭取權益意味著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但我們也知道權利不會與生俱有，每一個權利都是爭取來的結果，我們只能靠自己，面對那些認為我們貪婪、自私、不愛國、想要毀掉這個產業的指責。……我一直都說，我們只是爭取我們應得的、足夠生活的那部分……我想要讓他們[工廠、政府]知道，我們是有力量的……如果不這樣，甚麼都不會改變。（Akter 2017）

Nazma 從工會組織者視角，對孟加拉成衣加工業與工人的景況展開批判，包含批評全球資本利用孟加拉女性的順服和脆弱處境遂行壓榨，而國家為了追求出口貿易競爭力而持續壓低製造單價，助長剝削。她也提到工人組織行動的困難，一

doi:10.6342/NTU201903708

是擔憂黑名單的存在會阻礙後續生涯復職計畫，二是工會和資方的互信基礎低，難以達成談判成果。最後她指出，政府對於 2013 年 Rana Plaza 事件受害者的安置及補償至今未到位，持續漠視工人權益（ibid.）。

另一方面，同年底 Awaj 的一位合作顧問 Farzana Nawaz[53]，也在《每日星報》投書描述，該年全國成功簽訂的 10 件勞資團體協約（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 [CBA]），Awaj 基金會的成員參與了其中 6 件。Farzana（2018）概略描述其中二例：

> Sharifun 現在約 35 歲，在距離達卡加工出口區不遠的 Ashulia 地區一間成衣廠上班。她號召同事組織工會，在今年成功跟工廠負責人簽定協議，協議重要內容包含：每年 8%的加薪（孟加拉《勞動法》的規定是 5%）、年休假由 11 天增為 22 天、增加產假津貼、改善日間兒童照顧中心餐食等。「幾年前，我根本無法想像站在廠長面前說話。」Sharifun 說，「但我現在經常代表其他員工跟他談話。」
>
> Bilkis 在他們工廠成功與雇主達成協議，為懷孕員工支付超聲波檢測費用，以及降低懷孕員工的日產量標準。

Farzana 認為，在這兩例中，工人都爭取到優於法律最低保障的條件，「長久以來有許多女性工人因為懷孕而遭解雇，這樣看來，這些新協約的簽訂可以說具有突破性意義」(ibid.)。然而，她也描述不樂觀的案例：

> Yasmin 試圖在她工作的工廠號召組織工會，以便向工廠協議生產津貼、病假等法定權利，以及處理無預警解雇問題。當工廠負責人知道她們向勞工局提出籌組工會申請時，就解雇了以 Yasmin 為首的 50 位員工。之後有些被解雇員工表示，曾受到來自廠方的暴力威脅。Yasmin 在失業的同時，還必須處理和工廠的訴訟，使她自己和家人都面臨沉重的財務和心理壓力。

[53] Farzana Nawaz 所任職的 C&A Foundation，是一個致力於改善時尚產業鏈各個環節的跨國顧問機構，參考官方網站 https://www.candafoundation.org/。

doi:10.6342/NTU201903708

相較於順利簽定團體協約的例子，與 Yasmin 相似的遭遇實際上更為普遍。孟加拉成衣加工業工會和勞工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現況，可從以下三條社會歷史脈絡來理解：合法卻長期受壓抑的企業工會、活躍的工聯和勞工非政府組織、與女性運動之間的互動和分野。

根據社會學者 Rahman 和 Langford 的研究，在 80 年代軍政府大力推行私有化、自由化經濟政策之際，跨國紡織、成衣產業鏈也在大舉從東亞遷移。當時軍政府只允許所屬政黨的側翼工會合法運作，導致許多工會只能轉入地下，同時造成工會之間的嚴重分歧與惡性競爭，而合法工會長期以政黨意見為表率，也使民間對工會的印象偏負面，認為他們多數只圖利自身、利用關係謀取權位，而不在乎真正促進勞資溝通和解決勞資糾紛，這類印象部分持續至今（Rahman & Langford 2012：89-90）。

> Fahim（28 歲，加工出口區工廠關務）：「你問我有沒有聽說過工會？有，當然，我們工廠就有工會。但是我不喜歡他們，他們都是些自私自利的人。」（2016/08/15 田野筆記）

> Anika（26 歲，加工出口區工廠領班）：「我知道工會……但是我不會加入，因為沒意義。」（2016/08/22 田野筆記）

1990 年國會民選化後，雖然合法工會數量有所增加[54]，但在兩大政黨激烈的派系競爭，加上市場自由化、私有化、出口導向等經濟意識形態的主導，使工會發展持續受壓抑，制度性限制也多，例如現今在加工出口區，僅能在國家管理局的監督下經選出工人代表組成「工人福利協會」（Worker's Welfare Association），而限制組織工會[55]。而在加工出口區以外的工廠，即使員工能在法律保障下組織工會，實際運作難度卻相當高，要面對工廠管理者或明或暗的騷擾，嚴重者像是威脅人身安全、解僱或揚言關廠。面對上述困難，工會聯合會和勞工非政府組織的支持，便具有關

[54] 當時規定企業工會的成立門檻，是取得廠內員工總數的 30%連署成為會員，才可向勞工局登記成立。

[55] 直到 2017 年才「著手研擬」加工出口區員工成立工會的法規辦法，見報導 Ovi (2017) Government to Set Plan to Allow Trade Union at EPZs. *Dhaka Tribune*. Discover May 26.

doi:10.6342/NTU201903708

鍵作用（Khan 2002；Rahman & Langford 2012；Rock 2001：38-40）。

根據政治經濟學者 Shamsul Khan 的研究，孟加拉的工聯和勞工非政府組織，除了能在平時提供企業工會法律協助、財務支持，也能在發起抗爭運動時提供策略、協助動員。對成立初期的工會而言，這些外在資源和支持，深切影響其日後能否順利自主運作。然而，從企業工會到工聯、勞工非政府組織，不同團體間往來容易埋藏衝突，後兩者在實際促進工人權益上是否有積極作為，還是僅周旋於工廠、工會、政府部門之間尋利，經常成為爭議焦點（Khan 2002：184、196）。不過，這之中也出現了像 Nazma 這樣能結合兩種不同組織力量者，利用組織性質差異，擴大行動空間。

儘管學者認為成衣業工會組織在 2006 年以前發展遲滯、自主性低、無穩健力量（Rahman & Langford 2012：90），然而，在文獻中其實可見到，由該產業的工人所發起的集體爭權行動，如罷工、靜坐、遊行等，其實持續不斷，只是未必由工會主導（Khan 2002：182），如 90 年代 Saraka Garment 事件所引發的抗爭。

> 1991 年 1 月 1 日，……2000 多名來自不同成衣廠的女性工人，在達卡街頭發起抗議遊行，要求發放補償金給在前一年 12 月 27 日 Saraka Garments 工廠大火中喪命的 25 名女性及孩童的家屬；以及，由政府主持調查失火原因和強化廠房安全。（Zaman 2001：155，引自 Alam 1995：41）

90 年代，與 Saraka Garment 事件約同時期的成衣加工業工人運動訴求，主要集中於：提升廠房安全、按時支付薪資和加班費、訂定週休一日和合理產假制度、補齊正式有效的聘僱合同、限制童工工作內容和時數、建造男女分隔的廁所和更衣間等等。當時的運動，得到國內重要人權團體和女性團體（如孟加拉婦女會 Mahila Parishad）的聲援，其中女性團體對於早期成衣業工人運動的聲援，使女性工人在 1990 年代被視為在地女性運動的新生力量（Zaman 2001：156）。

然而，即便和女性運動的訴求在許多方面能相呼應，在後續發展中，部分成衣業工會的領導者越來越表露出，不認同將女性工人運動與其他女性運動混為一談的態度。她們認為：

doi:10.6342/NTU201903708

> 來自都市的女權運動者，願意對抗的是她們眼裡的父權體制象徵性表現，例如在鄉下地方受不合理伊斯蘭宗教裁決（*fatwas*）所壓迫的婦女。她們並不認為，在工廠工作的女性也是父權體制受害者，也不瞭解工人。（Karim 2014：62）

上述主張顯示，至少在女性工會領袖中，肯認工人身份，並且從工人位置具體化權利的積極主張，而不願被代言或隱匿在其他階級女性的訴求之後。這也顯示，在權利概念的生成過程中，身份與階級的差異也在持續確立，女性工人的權利形式與社會效果持續被協商、轉化。在多元的工人團結形式中，工會難脫歷史包袱且須面對較多法規面限制；勞工非政府組織則具有較彈性的制度空間。勞工非政府組織、工會聯合會、基層企業工會三者，形成相互提攜但也各自為謀的發展趨勢。

二、國家／跨國家情境

根據社會學者 Rahman 和 Langford（2012：90-91）的看法，2006 年 5 月所發生的一次工潮，引起跨產業勞、資團體的廣泛關注，挑戰紡織成衣業長久未動搖的官商支配結構（ibid.：102），帶動自主工會數量的成長。

該次工潮的過程大致是，首先在該年 5 月 11 日，毛衣廠 F.S. Sweater 的工人因不滿廠方欠薪而發起罷工，一名工人在 19 日不幸於警方拘捕行動時中槍身亡；20 日，兩名工人領袖被警方拘捕，另有多名工人被宣告解雇。在 18 日，另一間工廠 Universal Knitting Garments 的員工，在廠方拒絕與工會代表協商下被禁止進入工廠。與兩個工廠工會各有連結的兩個工聯會決意連線，在 22 日、23 日於達卡市區不同地點發起共 9 次抗議集會，包括 Uttara、Mirpur、Mohakhali、Tejgaon 等區，動員超過 1 萬人。事後統計，有 16 間工廠遭燒毀、50 間廠房被破壞、400 多間工廠暫時停工，破壞規模和暴力性均突破以往，連管制甚嚴的達卡加工出口區都成為衝突地點，政府最終派出軍警強制鎮壓，過程中造成 2 人身亡（Siddiqi 2017：94-95）。

BWSC（Bangladesh Centre for Workers Solidarity）[56]的負責人 Kalpana

[56] Bangladesh Center for Worker Solidarity [BCWS] 成立於 2001 年，創辦人 Kalpana Akter 本身也

doi:10.6342/NTU201903708

Akter 表示：「我們沒辦法控制工人的怒氣……這是他們唯一可以表達的方式。今天早上一位年約 30 歲的女人來到我辦公室，激動地告訴我：『我剛剛用磚頭砸了工廠的玻璃窗……他們把我開除又沒有付我 14 天的薪水……所以我砸了工廠的玻璃窗。』」（ibid.：95）

五月工潮的收場，是由政府指定「孟加拉織品製造與出口工業協會」（Bangladesh Garment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Association [BGMEA]）出面，而勞方則由 SKOP[57]為代表，雙方進行談判，於 6 月 12 日簽訂〈和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內容包含資方需要發給所有員工正式聘僱合同、提高最低工資、每週休假一日、保障產假、撤銷所有控告、保障成立工會權利。而 BGMEA 也要求政府成立工業警隊，以維護業主財產和人身安全（Rahman & Langford 2012：102）。

〈備忘錄〉最終並未發揮預期效果。不僅 SKOP 的代表性受質疑，政府後續未能有效監督，也使〈備忘錄〉內容難以落實（Siddiqi 2017）。成衣加工業中政、商界高層的密切往來關係，以及在工會受壓抑而缺乏調節力的情況下，工人的不滿長期無法宣洩，終而引發激烈的抗爭行動。此時部分工會和工聯延續過去在軍政府獨裁治理時期以政黨意志為依歸的舊習，那麼即便頻繁地動員抗爭，仍是雷聲大雨點小，落實度低。

Nazma 投書中提到的 Rana Plaza 事件，是孟加拉國內近年來傷亡人數最慘重的單一工業事故。事實上，因輕忽消防措施、廠址設於擁擠街區、建物本身風險係數高等因素，使工業事故發生頻仍，成為勞資衝突的導火線之一。在 2012 年 11 月 24 日發生的 Tazreen Fashions garment factory 大火[58]，造成百餘人死亡，此事件中最受爭議的，是有至少 112 名工人因無法逃出失火廠房而死亡，而保守估計的 172

曾是成衣廠工人，此組織並不以街頭行動為主旨，但也參與了 2006 年五月事件（Siddiqi 2017：95）

[57] Sramik Karmachari Oikya Parishad，即 United Front of Workers and Employees，成立於 1984 年，是第一個自主工人組織，曾是 1985 年爭取訂立全國紡織、成衣業工人最低薪資標準的主要推手，後併入「全國工會聯合會」（National Unions Federation）（Rock 2001：34-37）。

[58]該工廠訂單主要來自於 Walmart、Sears、Disney、C&A、the Edinburgh Woollen Mill 等歐美企業（Akash 2018）。

doi:10.6342/NTU201903708

名傷者中，有許多是因為從二、三樓跳出逃生而受傷。不到半年後，2013 年 4 月 24 日發生的 Rana Plaza 崩塌事件[59]，造成一千多人死亡，兩起嚴重的工業事故，引起大篇幅國際關注，在地非政府組織、國際工會組織如 IndustriALL、全球工會（UNI Global Union）等團體的介入下，終於促使孟加拉政府再度正式修訂《勞動法》（Bangladesh Labour Amendment Act 2013），調高基本工資[60]，更突破性地由 2 個國際工人組織、180 家成衣品牌及銷售商、7 個孟加拉本地工會，簽署《建築防火與安全協議》（Accord on Building Fire and Safety）（Zajak 2017：1009）[61]。

《建築防火與安全協議》內容主要是建立一個獨立於政府的多方監察平台，在五年期限內，對孟加拉境內接受外包訂單的 1,600 餘間紡織、成衣廠進行安全檢查，包含廠房之消防、電力、建築物件等。簽署該協議的品牌企業必須挹注基金，供廠方改善廠房條件、公布安全報告、提出補救措施和安全訓練，若未達成便將暫時停單直到改善，或由協議監察平台訴請地方執法單位施予制裁。協議內容也包含，國際工會須協助培訓在地工會成員，協助建立廠內人員訓練計畫與衛生安全委員會，以檢討現行建物管理法規、研擬訴願管道，讓工人可以舉報衛生與安全風險（Zajak 2017）。

關於此《協議》的執行過程及影響，社會學者 Zajak 記錄了一段在地工聯運用《協議》介入勞資爭議的經驗：

> 我們向《協議》執行機構反映，有間工廠裡的工會幹部通報說他們工廠的二樓樓板放置太多機器、有超載情形，希望機構可以去查看。機構之後真的突襲檢查那間工廠，確認通報情形屬實，但有幾位工會幹部在這

[59] 2013 年 4 月 24 日，一棟名為 Rana Plaza（中文一般譯作熱那大廈）的八層樓廠房建築坍塌，造成 1134 名工人死亡、2500 多人受傷。在該建築中有多間工廠，生產 Walmart、JC Penny、Sears、H&M、Tommy Hilfiger 等品牌的產品（Karim 2014：1）。

[60] 但加工出口區工廠仍然被禁止組織工會。

[61] 另有由 28 個國際品牌與工廠聯合成立孟加拉勞工安全聯盟（Alliance for Bangladesh Worker Safety），主要目的也是要求針對工廠廠房進行定期安檢、強化消防安全措施、避難演練等。關於《安聯》及《協議》的簡介和比較，見報導 Tanjeem (2017) Rana Plaza Special: Thinking beyond Accord and Alliance.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May 22; Rahman (2016) Governance after Rana Plaza.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April 21. 因《協議》影響範圍較廣，所以本論文僅以《協議》為討論案例。

doi:10.6342/NTU201903708

之後就被解雇了。於是我們又向機構反映這件事，機構於是跟廠主溝通，但廠主又跑去找 BGMEA，最後我們得到回覆說：「已經讓其中兩名工會幹部復職。」（ibid.：1022）

Zajak 的描述，反映出《協議》雖然是以提升工作環境安全為主要目標，實際上被延伸、應用至其他勞動權益訴求上。雖然《協議》企圖讓國際品牌經銷商不再置身事外，而是實際投入資源以改善工作場所條件，鞏固勞動監督和稽核程序，但因標準模糊、與在地情況多處脫節、無法阻止國際品牌經銷商轉嫁成本到在地工廠，因而爭議不斷。例如，《協議》執行機構曾一口氣判定 31 間廠房沒有符合安全標準，並訴請地方法院發布停工令，但卻因沒有提出配套措施，使多達 14,000 名工人面臨失業[62]。這些爭議在 2018 年五年期效即將屆滿時，被搬上檯面，政府、企業、BGMEA、國內外工人組織，為是否延長該《協議》期效而爭論不休[63]。至本論文完成時，已決議不續簽，並且展開移交工作討論[64]。

本段我以五月事件及 Rana Plaza 事件與《建築防火與安全協議》為例，檢視成衣業工人運動發展軌跡。經歷重大事故以及一次次罷工、大規模抗爭，在地工人組織逐漸協力跨國勞動監察體系（audit system），在跨國紡織、成衣業的多方角力中，開發新策略。相較於早期，國家和跨國資本共構種種不利工會發展的條件，對工會抱持很深負面看法，現今則可見工會、工聯和勞工非政府組織林立，經由在地與跨國組織的頻繁互動而壯大。對工廠的勞動監督與稽核，如同《建築防火與安全協議》這樣的跨國勞動檢查部門，已隱然成為一項「專門事業」，以另類方式引渡跨國性治理力量而介入地方社會。

跨國非政府組織與在地組織間，同時存在矛盾與連結，而新型態權力關係和壓迫結構也在這樣的過程中形成。然而，像《協議》這樣的跨國聯合勞檢部門能否發揮作用，仍然充滿不確定性，如是否能替代國家職權、如何避免成為依附既成勞資關係結構來處理資源分配問題的資本附庸，都仍然是工會和勞工非政府組織要持

[62] 見報導 Tanjeem (2017) Rana Plaza Special: Thinking beyond Accord and Alliance.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May 22.

[63] ibid.

[64] 見報導 Star Business Report (2019) Accord to stay on until May 19.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April 16.

doi:10.6342/NTU201903708

續嘗試的課題。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我首先以 Awaj 基金會為例，描述勞工非政府組織中介權利概念，連結權利概念與日常可操作的知識，形塑權利的文化價值。這樣的勞工非政府組織在運作時比正式工會有更多彈性，所營造的外於工廠與家戶而著重女性連帶的新空間，有助於經歷權利失落的女性工人，建立支持網絡、進行交換活動和學習權利知識，開啟重新定義自身的契機。從肯認工人身份到從工人位置具體化對於權利的積極主張，不隱匿在其他階級女性的訴求之後，可見在權利生成過程中，身份與階級的差異也持續分化、確立。

從近年工人運動發展的重大事件，可見到在眾多工人團結形式中，工會較難擺脫歷史包袱且須面對較多法規面限制；勞工非政府組織則具有較彈性的制度空間。勞工非政府組織、工會聯合會、基層企業工會三者，相互提攜但也各自為謀。在複雜的國家／跨國家情境裡，隨著跨國工運的發展以及紡織、成衣產業鏈的區位轉移，在地勞工組織頻繁地與國際工會和工人組織互動，在試圖強化對在地工廠的勞動監督之外，不斷創造新的權利意義競爭場域。

孟加拉成衣加工業發展過程中，女性工人對權利的解讀受到工會、在地組織、政府部門、國際組織的互動影響。權利以一種知識形式，經由協商、轉化而成為新社會分類，再生產階級與身分。

doi:10.6342/NTU201903708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成為工人之後

本研究從孟加拉女性在「成為工人」之後面臨權利處境多方面惡化的危機開始，探討在達卡市的都市脈絡中，女性、工人等不同身份權利的動態交織，以及在權利形構過程中治理的再生產。

達卡是全國政治與經濟發展的中心，由國家主導規劃而吸納周圍地方資源來集中打造都市地景，在 1980 年代國家經濟自由化改革後，外資匯集下更加速都市化發展（Basu 2012：1-34）。以成衣及服飾加工品為大宗的加工出口工業，僱用大量女性為工廠工人，也隨著工廠林立在都會周圍地帶而向都市遷移。

包含都市地景分化、侍從主義政治、性別秩序等不同治理力量的交織、競合，以及所形成的排擠和衝突，多重治理情境在女性工人身上體現。以達卡加工出口區為例，在外資工廠管理制度和國家訂定的加工出口區專門規範疊合下，形成有別於區外的性別秩序；加工出口區外，性別秩序則與都市空間政治相互纏繞，造成女性工人的居住難題。

隨著人口快速膨脹，達卡市內貧民區數量和非正式經濟也顯著增長，貧民區也成為眾多來到達卡、進入工廠工作的女性所生活的地方。因都市行政體系不直接落實，貧民區內形成流動而「開放」的權利狀態和新政治空間，女性斬獲更多機會參與其中，尤其是參與各種非政府組織執行發展計畫。貧民區內基礎生活機能的維繫，依賴活躍的在地組織以及與區外保持靈活連結關係的少數居民，藉由合法與非法的橋接、侍從主義分配政治和國家治理權威的再現，形成對內部的支配機制，並調節都市對貧民區強弱不定的排除壓力。貧民區的存在持續在既定治理機制與公民社會內涵中製造灰色地帶，並突顯權利本身的參差、變動、累積性質。

隨成衣及服飾加工產業鏈在孟加拉國內擴張，出現各類促進工人權益的組織，開始針對女性工人的日常需求提供相應資源。在經營以女性為連帶的新社會空間中，促成日常需求與權利主張的連結，形塑權利概念的文化價值，繼而提升女性工人參與勞權協商的意願。不過在此過程中，身份與階級的分野持續確立，且隨著跨國工運的發展以及紡織、成衣產業鏈的區位轉移，品牌企業、工廠、在地與國際勞工組織之間的多重關係和行動，使勞資情境和工人權利意義的競爭場域都更加複

doi:10.6342/NTU201903708

雜。

孟加拉加工出口工業的發展過程中，女性的「工人」身份承受多重治理和介入。作為參與都市空間政治的一員，女性工人尤須面對性別秩序和國家發展計畫的交鋒，對權利的解讀更受到工會、在地組織、政府部門、國際組織的互動影響。不過在非政府組織的活躍下，她們以更經驗性、脈絡性的方式認知權利，並因應地方權力關係、權威和行政體系而實踐，以便能在成為工人的同時，也確保安全、維持社會連帶和自主性。因此，對女性工人來說，維護「作為工人」的權益，與成為「更理想的」女性、公民，時而相互嵌合，彰顯出女性主體能動性的多重演繹。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首先是對於「權利」此一概念所涉及的內容，本論文尚未能細緻釐清，例如從孟加拉法律的實質內涵來討論，以及女性工人如何理解權利。其次，關於權利作為一種知識體系，與殖民歷程的關係，以及可能衍生的治理性及國家想像，也有待更深入的梳理。

在進行田野調查時，因多數孟加拉工人僅能以孟加拉語溝通，而必須倚靠英語或他人協助翻譯才能順利交流，語言轉譯過程的不即時、不完整、難以挖掘更深層想法，是相當可惜的地方；在經費限制下，只能在有限的約訪時聘請翻譯，以致失去許多記錄工人和貧民區居民日常對話的機會，是另一可惜之處。在台灣能取得有關孟加拉的文獻資料並不豐富，使田野工作一開始的資料蒐集有過於零碎之虞。不過，本次田野調查的珍貴收穫之一，是能與 Awaj 基金會、Korail 貧民區建立連結，兩者皆應有更多層次的面貌留待研究者發掘。

doi:10.6342/NTU201903708

參考文獻

容紹武

2005〈社區的界限：權利與文化的研究－台中東勢的個案分析〉。《考古人類學刊》62：93-121。

2009〈觀看法律、尋找文化──解構與重構法律人類學〉。《思與言》47(4)：237-259。

Aggarwal, A., M. Hoppe, and P. Walkenhorst

2008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South Asia: Industrial Islands or Vehicles for Diversification?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Ahmed, F. Erfan

2004 The Rise of the Bangladesh Garment Industry: Globalization, Women Workers, and Voice. NWSA Journal: 34-45.

Ahmed, F. Z., A. Greenleaf, and A. Sucks

2014 The Paradox of Export Growth in Areas of Weak Governance: The Case of the Ready Made Garment Sector in Bangladesh. World Development 56: 258-271.

Alam, S. M. S.

1995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the Fall of the Military Regime in Bangladesh.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7(3): 28-42.

Anjaria, J. Shapiro

2016 The Slow Boil: Street Food, Rights and Public Space in Mumbai.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su, Ipshita ed.

2012 State of Cities: Urban Governance in Dhaka. Institute of Governance Studies, BRAC University.

BEPZA

2016 BEPZA's Activities to Ensure Safety and Strengthen Security. BEPZA Bulletin 7-9(40): 6.

Chatterjee, Partha

2007[2004]《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眾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 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田

doi:10.6342/NTU201903708

立年譯。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Dannecker, Petra

2000 Collective Action, Organisation Building, and Leadership: Women Workers in the Garment Sector in Bangladesh. Gender & Development 8(3): 31-39.

Das, Veena

2011 State, Citizenship, and the Urban poor. Citizenship Studies 15(3-4): 319-333.

Das, Veena and Shalini Randeria

2015 Politics of the Urban Poor: Aesthetics, Ethics, Volatility, Precarity. Current Anthropology 56(S11): S3-S14.

Desmond, Matthew

2016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Devine, Joseph

2003 The Paradox of Sustainability: Reflections on NGOs in Bangladesh.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90(1): 227-242.

Dirks, Nicholas B.

1993 Informants: Biography of an Archive. In 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 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 *In* Carol A. Breckenridge and Peter Van Der Veer, eds. Pp. 279-313.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Eusuf, M. A., A. Faruque, and A. Rahman

2007 Institution for Facilitating FDI: Issues for BEPZA, Bangladesh. IPPG Briefing Paper (10). IPPG Program Office.

Feldman, Shelly

1998 Presenting Islam: Manipulating Gender, Shifting State Practices, and Class Frustrations in Bangladesh. Appropriating Gender. *In* Women's Activism and Politicized Religion in South Asia. Patricia Jeffery and Amrita Basu, eds. Pp.33-52. London: Routledge.

2001 Exploring Theories of Patriarchy: A Perspective from Contemporary Bangladesh. Signs 26(4): 1097-1127.

Guhathakurta, Meghna

2002 The Nature of the Bangladeshi State. *In* Human Rights in Bangladesh. Hameeda Hossain, ed. Pp. 19-31. Dhaka: Ain O Salish Kerndra.

doi:10.6342/NTU201903708

Hackenbroch, K., and S. Hossain

2012 The Organised Encroachment of the Powerful—Everyday Practices of Public Space and Water Supply in Dhaka, Bangladesh.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13(3): 397-420.

Hossain, H., R. Jahan, and S. Sobhan

1988 Industrialization and Women Workers in Bangladesh: from Home-based Work to the Factories. *In* Daughters in Industry: Work, Skills, and Consciousness of Women Workers in Asia. Noeleen Heyzer, ed. Pp. 107-135. Kuala Lumpur: 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

Hossain, Naomi

2018 Post-conflict Ruptures and the Space for Women's Empowerment in Bangladesh.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68: 104-112.

Hossain, Shahadat

2013 The Informal Practice of Appropri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Experience from a Bosti in Dhaka.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5(1): 209-224.

Jahan, Roushan

2018 Men in Seclusion, Women in Public: Rokeya's Dream and Women's Struggles in Bangladesh. *In* The Challenge of Local Feminisms: Women's Movements in Global Perspective. A. Basu, ed. Pp: 87-109. Routledge.

Kabeer, Nalia

1991 The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Women, Islam and the State in Bangladesh. *In* Women, Islam and the State. D. Kandiyoti, ed. Pp: 115-143.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7 Women, Wages and Intra-household Power Relations in Urban Bangladesh.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8(2): 261-302.

2005 'Growing' Citizenship From The Grassroots: Nijera Kori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In Bangladesh. The Bangladesh Development Studies 29(3/4): 1-20.

Karim, Lamia

2011 Microfinance and its Discontents: Women in Debt in Bangladesh.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4 Analyzing Women's Empowerment: Microfinance and Garment Labor in Bangladesh. Fletcher F. World Aff. 38: 153-166.

Khan, Mushtaq

doi:10.6342/NTU201903708

2000 Class, Clientelism and Communal Politics in Bangladesh.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Essays Presented to Irfan Habib. K.N. Panikkar, T.J. Byres, and U. Patnaik, eds. Pp: 572-606. New Delhi: Tulika.

Khan, Shamsul

2002 Trade Unions, Gender Issues and the Ready-Made Garment Industry of Bangladesh. *In* Women's Employment in the Textile Manufacturing Sectors of Bangladesh and Morocco. C. Miller and J. Vivian, eds. Pp.: 179-218.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Kibria, Nazli

1995 Culture, Social Class, and Income Control in the Lives of Women Garment Workers in Bangladesh. Gender & Society 9(3): 289-309.

Mahmud, Simeen, and Nalia Kabeer

2003 Compliance Versus Accountability: Struggles for Dignity and Daily Bread in the Bangladesh Garment Industry. Bangladesh Development Studies 29(3-4): 21-46.

Menon, N., and Partha Chatterjee

2010 Empire and Nation: Selected Essays.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ridha, Malay Kanti, Awlad Hossain, Badrul Alam, Bidhan K. Sarker, Tasnuva Wahed, Rodela Khan, and Suchismita Roy

2009 The Perceptions of Community Groups to Improve MNCH in Urban Slums: An Exploratory Case Study of Korail Slum in Dhaka. MANOSHI Working Paper Series : 9. Dhaka: ICDDR, B and BRAC.

Münster, D., and C. Strümpell

2014 The Anthropology of Neoliberal India: An Introduction.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ociology 48(1): 1-16.

Nandy, Ashis

2012[1976]〈印度文化中女人與女人性的對峙：文化與政治心理學的論說〉[Woman versus womanliness in India: An essay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貼身的損友：有關多重自身的一些故事》。丘延亮譯。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

Neveling, Patrick

2015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and Global Class Formation. *In* Anthropologies of Class: Power, Practice, and Inequality. D. Kalb and J. G. Carrier, eds.

doi:10.6342/NTU201903708

Pp.:164-1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hman, Zia, and Tom Langford

2012 Why Labour Unions Have Failed Bangladesh's Garment Workers. In Labour in the Global South. *In* Challenges and Alternatives for Workers. S. Mosetsa and M. Williams, eds. Pp.: 87-106. Genf: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Riaz, Ali

2016 Bangladesh: Islamist Militancy, Democracy Deficit and Where to Next? Report. Doha: Al Jazeera Center for Studies.

2018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The Narratives of Sacularism and Islam in Bangladesh. Asian Affairs 49(2): 301-318.

Rock, Marilyn

2001 The Rise of the Bangladesh Independent Garment-Workers' Union (BIGU). *In* Organising Labour in Globalising Asia. A. Brown and J. Hutchison, eds. Pp.: 28-49.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Salway, S., S. Rahman, and S. Jesmin

2003 A Profile of Women's Work Participation Among the Urban Poor of Dhaka. World Development 31(5): 881-901.

Schendel, William von

2009 A history of Banglade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ddiqi, Dina Mahnaz

1996 Women in question: Gender and labor in Bangladeshi factories.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0 Miracle Worker or Womanmachine? Tracking (Trans)national Realities in Bangladeshi Factori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5(21/22): L11-L17.

2003 The Sexual Harassment of Industrial Workers: Strategies for Intervention in the Workplace and Beyond. CPD-UNFPA Publication Series 26: 40.

2006 In the Name of Islam? Gender, Politics and Women's Rights in Bangladesh. Harvard Asia Quarterly 10(1): 4-14.

2009 Do Bangladeshi Factory Workers Need Saving? Sisterhood in the Post-Sweatshop Era. Feminist Review 91(1): 154-174.

2010 Politic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Bangladesh: Histories, Ruptur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Political Islam and Governance in Bangladesh. Riaz, A., C. C. Fair, eds. Pp.: 33-60. Routledge.

2015 Starving for Justice: Bangladeshi Garment Workers in a 'Post-Rana

doi:10.6342/NTU201903708

Plaza'World.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87: 165-173.

2017 Unions or NGOs? Organizing Labor under the Neoliberal Gaz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7 FINDAS International Workshop: Women's Work in South Asia in the Age of Neo-liberalism, ILCA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Tokyo, January 8. http://www.tufs.ac.jp/ts/society/findas/2017-findas-international-ws-proceedings_final-text-updated-170727-compressed

Sinthia, S. A.

2013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of Slum Prone Area of Dhaka City.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7(3): 701-708.

Sharma, Aradhana

2008 Logics of Empowerment: Development, Gender, and Governance in Neoliberal India.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States of Empowerment. *In* The State in India after Liberalization. Pp. 87-106. Routledge.

White, Sarah C.

2010 Domains of Contestation: Women's Empowerment and Islam in Bangladesh.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33(4): 334-344.

2012 Beyond the Paradox: Religion, Family and Modernity in Contemporary Bangladesh. Modern Asian Studies 46(5): 1429-1458.

Zaman, Habiba

2001 Paid Work and Socio-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Garment Workers in Banglades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1(2): 145-160.

Zajak, Sabrina

2017 International Allies, Institutional Layering and Power in the Making of Labour in Bangladesh.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8(5): 1007-1030.

Zohir, Salma Chaudhuri

2003 Household Response to Gender Issues: A Survey on Households of Female EPZ Workers in Bangladesh. *In* Tracking gender equity under economic reform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outh Asia. S. Mukhopadhyay and R. M. Sudarshan, eds. Pp.: 64-88. New Delhi: Kali for Women.

報章雜誌

National News of Agency (Banladesh Sangbad Sangstha)

doi:10.6342/NTU201903708

2016 Gulshan Attack a Stain on Country's Image: PM. The Daily Star, July 17.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politics/bangladesh-committed-against-militancy-pm-1255090

Ahasan, Nazmul

2017 Korail Slum Dwellers: Perenially Punished. The Daily Star, July 21.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star-weekend/korail-slum-dwellers-perenially-punished-1436167

Ahmed, M. A.

2018 Increasing the Capacity of Community Clinics. The Daily Star, December 23.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opinion/governance/news/increasing-the-capacity-community-clinics-1677346

Akash, A. R., and R. U. Mirdha

2017 Female Garment Workers' Dormitory has no Takers. The Daily Star, November 3.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business/female-garment-workers-dormitory-has-no-takers-1485709

Akash, A. R.

2018 6 Yrs of Tazreen Fire: Survivors Pin Hope on Own Factory. The Daily Star, November 24.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backpage/news/6-yrs-tazreen-fire-survivors-pin-hope-own-factory-1664467

Akter, Nazma

2017 Call to Regain Our Power as Workers. The Daily Star, April 30.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opinion/human-rights/call-regain-our-power-workers-1398358

Anam, Tahmima

2016 Horror and Sorrow in Dhaka.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4. Retrieved: https://nyti.ms/29sHzzzr

2017 Under the Shadow of Terrorism in Dhaka.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9. Retrieved: https://nyti.ms/2vhXtrM

Barry, E., and M. Sattar

2016 Bangladesh, Blaming Local Groups for Attacks, Seeks Suspects Tied to ISI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9. Retrieved: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20/world/asia/bangladesh-dhaka-attacks-isis.html

Correspondent, T. D. S. S.

2017 Fire Strikes Korail Slum, Again. The Daily Star, March 17. Retrieved:

doi:10.6342/NTU201903708

https://www.thedailystar.net/city/fire-strikes-korail-slum-again-1377202

Dey, NC.

2017 Fire Outbreak at Korail: Ignorance or Negligence? The Daily Star, March 19.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perspective/ignorance-or-negligence-1377892

Editorial

2016. Our Sorrows Know no Bounds. The Daily Star, July 3.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editorial/dhaka-attack/our-sorrows-know-no-bound-1249336

Halder, Amiya

2017 Sramik Awaaz: The Unheard Four Million. The Daily Star, April 17.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star-weekend/the-unheard-four-million-1390813

Hammadi, S., R. Scammell, and A. Yuhas

2016 Dhaka Cafe' Attack Ends with 20 Hostages among Dead. The Gardian, July 3. Retrieved: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jul/01/dhaka-bangladesh-restaurant-attack-hostages

Hasan, R., and S. Mollah

2017 KORAIL SLUM: Goons Eating up Public Resources. The Daily Star, July 10.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frontpage/dhaka-korail-slum-goons-eating-public-resources-1430713

Hossain, Mansura

2014 Women's Hostels Spring up around the city. Prothom Alo, September, 28. Retrieved: https://en.prothomalo.com/bangladesh/news/54311/Women-s-hostels-spring-up-around-the-city

Huq, Chaumtoli

2015 Wages and Safety: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The Daily Star, March 8.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wages-and-safety-two-sides-of-the-same-coin-50818

Hussain, Shaheen

2017 Korail Slum. The Daily Star, July 12.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letters/korail-slum-1431637

Islam, S., and M. J. Khan

2018 All-out efforts in tough times only. The Dily Star, July 1. Retrieved:

doi:10.6342/NTU201903708

https://www.thedailystar.net/frontpage/all-out-efforts-tough-time-only-1597951

Jahan, Nilima

2017 In search of Home. The Daily Star, March 31.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star-weekend/search-home-1383988

Karmakar, Pankaj

2015 Locals' Role Helps Improve Community Clinic Services. The Daily Star, June 20.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city/locals-role-helps-improve-community-clinic-services-100090

Khaled, Sarwar Md. Saifullah

2017 Safe Accommodation for Single Working Women Needed. The Independent, September 28. Retrieved: http://www.theindependentbd.com/post/116298

Mahmud, A. H.

2017 Slums are More Expensive per Square Foot than Gulshan. Dhaka Tribune, March 19. Retrieved: https://www.dhakatribune.com/ bangladesh/dhaka/ 2017/03/19/slums-expensive-per-square-feet-gulshan

Manik, J. A., G. Anand, and E. Barry

2016 Bangladesh Attack Is New Evidence That ISIS Has Shifted Its Focus Beyond the Mideast.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 Retrieved: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03/world/asia/bangladesh-hostage-standoff.html?_r=0

Mirdha, Refayet U.

2018 Two More Dormitories for Female Garment Workers. The Daily Star, July 30.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business/two-more-dormitories-female-garment-workers-1613290

Mollah, S. and M. Saad

2016 Fire-ravaged Korail Slum Gets New Look. The Daily Star, December 31.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frontpage/fire-ravaged-korail-slum-gets-new-look-1338124

Mujumdar,V.

2015 ‘Workers’ Voices: Documentary Uses Personal Stories to Highlight Women’s Leadership in Bangladeshi Garment Industry. India.com, April 16. Retrieved: https://www.india.com/lifestyle/workers-voices- documentary-uses-personal-stories-to-highlight-womens-leadership-in- bangladeshi-

doi:10.6342/NTU201903708

garment-industry-2-353207/.

Nawaz, Farzana

2018 How Women Labour Leaders are Changing the Landscape in RMG. The Daily Star, April 24.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opinion/how-women-labour-leaders-are-changing-the-landscape-rmg-1566736

Ovi, I. H.

2017 Government to Set Plan to Allow Trade Union at EPZs. Dhaka Tribune, May 26. Retrieved: https://www.dhakatribune.com/business/2017/05/26/government-set-plan-allow-trade-union-epzs

Parveen, Shahnaz

2008 Woes of Single, Working Women Looking for a Lone Living. The Daily Star, December 14.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news-detail-66983

Prins, Annemiek

2017 Rickshaw Restrictions: Privilege for Some, Disaster for the Puller. The Daily Star, November 11.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star- weekend/rickshaw-restrictions-1488862

Rahman, Shahidur

2016 Governance after Rana Plaza. The Daily Star, April 21.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op-ed/politics/governance-after-rana-plaza-1211845

Saad, Muntakim

2017 Korail Fire Leaves Hundreds Homeless. The Daily Star, March 18.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city/korail-fire-leaves-many-nothing-1377628

Stark, Alexandra

2016 Dhaka Attack Part of a Larger Pattern of Terrorism in Bangladesh. The Diplomat, July 22. Retrieved: https://thediplomat.com/2016/07/dhaka-attack-part-of-a-larger-pattern-of-terrorism-in-bangladesh/

Staff Correspondent

2016. Exclusive Bus, Rickshaw for Gulshan Area. The Daily Star, August 11.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backpage/exclusive-bus- rickshaw-gulshan-area-1267753

2017 Housing Scheme for Dhaka City Poor a Must. The Daily Star, March 19.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city/housing-scheme-dhaka- city-poor-must-1378153

doi:10.6342/NTU201903708

2018 Dhaka Air Among the Worst. The Daily Star, March 19: Front Page.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frontpage/dhaka-air-among-the-worst-1550239

Star Business Report

2019 Accord to Stay on Until May 19. The Daily Star, April 16: Business.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business/accord-bangladesh-stay-until-may-19-1730200

Star Online Report

2017 500 Shanties Gutted in Korail Slum Fire, Online Report. The Daily Star, March 16.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city/fire-breaks-out-korail-slum-1376815

2018a. Fight against Militancy to Continue. The Daily Star, July 1.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dhaka-attack/dhaka-gulshan-cafe-attack-people-paying-tribute-victims-holey-artisan-bakery-1598158

2018b. Dhaka Sees Peace; Violence Elsewhere. The Daily Star, December 31: JS Polls 2018.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bangladesh-national-election-2018/dhaka-sees-peace-violence-elsewhere-1680679

Tanjeem, Nafisa

2017 Rana Plaza Special: Thinking beyond Accord and Alliance. The Daily Star, May 22. Retrieved: https://www.thedailystar.net/star-weekend/thinking-beyond-accord-and-alliance-1393888

電子資源與網路資料

Bangladesh Bank

2017 Full Export Data of 2015-2016.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bb.org.bd/econdata/index.php, accessed December 16, 2018.

Bangladesh Bureau of Statistics (BBS)

2015 Census of Slum Areas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2014 Dhaka. Electronic document, www.bbs.gov.bd, accessed December 18, 2018.

BEPZA.

2017 About BEPZA.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bepza.gov.bd/pages/details/about, accessed December 1, 2018.

2017 BEPZA Annual Report 2016-2017.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bepza.gov.bd/reports, accessed January 29, 2018.

doi:10.6342/NTU201903708

2018 Investor Report. Info of Dhaka EPZ.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bepza.gov.bd/investors/investor_report/dhaka-export-processing-zone-2, accessed November 17, 2018.

BGMEA.

2015 Number of Employee. Facts & Figures.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www.bgmea.com.bd/chart/number_of_employment_in_garment, accessed December 2, 2018.

Dhaka North City Corporation.

2016 Functions of Ward Councillors. Ward.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www.dncc.gov.bd/site/page/62c9064e-dca5-4bfe-9688-dae1426e2af8/Functions, accessed December 1, 2018.

Human Rights Watch.

2013 Bangladesh: End Violence Over War Crimes Trials.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hrw.org/news/2013/03/01/bangladesh-end-violence-over-war-crimes-trials, accessed November 28, 2018.

Mohammad Romel

2017 Sramik Awaaz: Workers Voices. 58min. Film South Asia 2017.

doi:10.6342/NTU201903708